

陽明後學對「朱子晚年定論」說之餘響

——張元忬《朱子摘編》析論*

游騰達**

王陽明（1472-1528）的《朱子晚年定論》是宋明儒學史上「朱陸異同論」的一重大關鍵，此作引發極大的迴響。不過，若欲論其支持者，多半僅能列舉清代李紱（1673-1750）的《朱子晚年全論》，實則中研院傅斯年圖書館所藏珍本——張元忬（1538-1588）纂輯的《朱子摘編》當是另一重要代表作。《朱子摘編》全書分上、下兩卷，上卷收錄陽明的《朱子晚年定論》，下卷則是張元忬為求佐證、輔翼陽明之說而輯錄朱子九十四首詩作的《悟後詩》。本文分析該書的序跋文字與刊版的經過，說明其編纂用心、策略與流通情形。繼之，闡釋張元忬在上卷寫作的案語，在承繼「晚年定論」之說外，也申述朱子、象山及陽明三人之學可相互融通為一的主張。再者，詳考下卷《悟後詩》所選輯詩作的寫作時間，說明其文獻效力恐有不足之處。但是，若針對纂輯詩篇之內容而觀，卻可看到張氏對「晚年定論」說的附議與加強舉證，不過，這些詩作的內容也呈現出朱子注重遊觀山水以體道以及兼採佛、老之說的學問面向，此二者則屬張元忬個人的獨特見解。本文對《朱子摘編》一書的考察與分析，當有助於豐富並且補充學界對於「朱陸異同論」之學術發展史的全面理解，同時也能反映出明代學者對朱子學的另一種認識與詮釋面向。

關鍵詞：朱陸異同、《朱子晚年定論》、張元忬、《朱子摘編》、《悟後詩》

* 本論文初稿曾宣讀於中央大學文學院儒學研究中心、中國文學系、中央研究院文哲研究所共同主辦之「2021年宋明清儒學的類型與發展 VIII 學術研討會」（2021年10月21-22日），感謝主持兼評論人賀廣如教授以及與會師長的寶貴意見與修改建議。今復蒙三位審查人惠賜高見，得以完善拙作。在此特致謝忱！

** 國立清華大學華文文學研究所副教授；Email: yutengta@mx.nthu.edu.tw。

「朱陸異同論」是宋明理學史上的一重要學術公案，當前學界針對此課題，不乏從「歷史源流」的學術發展觀點進行考究與研討的工作，成果斐然。¹晚近更有《歷代「朱陸異同」典籍萃編》(六冊)與《歷代「朱陸異同」文類彙編》(五冊)兩套叢書的出版，²可謂蒐羅全備，蔚為大觀。尤其前者，更是在往昔吳長庚主編《朱陸學術考辨五種》一書的基礎上，³在程敏政(篁墩，1444-1499)《道一編》、王守仁(陽明，1472-1528)《朱子晚年定論》、陳建(清澗，1497-1567)《學蔀通辨》、李紱(穆堂，1673-1750)《朱子晚年全論》、王懋竑(白田，1668-1741)《朱子年譜》等五部代表性作品之外，擴增為二十部密切相關且重要的典籍專著，這些研究材料的彙整與校刊，不僅為後續的研究帶來極大的便利，更在深度與廣度上大幅拓展「朱陸異同論」的研究視野與材料範圍。

惟綜覽這二十部入選的典籍，其中有一情況頗啟人疑竇，即我們熟知王陽明的《朱子晚年定論》是「朱陸異同」論史上的一重大關鍵，因為該書的編纂與刊行，雖出於陽明有意調停、化解自己與尊朱學者間的矛盾與紛爭，但亦是證明己說與朱子「晚年悔悟」之論無異，期望藉此能更順利地推闡其學說觀點。⁴不過，伴隨著陽明「良知」學說的風行所引發的迴響與產生的推動

¹ 關於「朱陸異同論」之學術史的研究甚夥，略舉其要者如：陳榮捷，〈元代之朱子學〉、〈從朱子晚年定論看陽明之於朱子〉，收入陳榮捷，《朱學論集》(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8)，頁299-329、353-383；吳長庚，〈鵝湖之會與朱陸異同「早晚論」的歷史演變〉，《朱子學刊》，1(1999)，頁78-98；蔡龍九，〈《朱子晚年定論》與朱陸異同〉(新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1)，頁11-172、319-336；游騰達，〈王懋竑《朱子年譜》探蹟與朱學宗旨之辯〉，《臺大中文學報》，65(2019)，頁117-162；田富美，〈清初朱陸異同論爭的一個側面——論王懋竑《朱子年譜》中鵝湖之會的書寫〉，《臺大中文學報》，72(2021)，頁149-190。

² 嚴佐之、戴揚本、劉永翔主編，《歷代「朱陸異同」典籍萃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顧宏義、嚴佐之主編，《歷代「朱陸異同」文類彙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

³ 吳長庚主編，《朱陸學術考辨五種》(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2000)。

⁴ 錢明在其研究中指出陽明編纂《朱子晚年定論》一書是「當時為緩解輿論壓力的權宜之計」，見錢明，《王陽明及其學派論考》(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頁441。至於東景南的新作，則詳細梳理陽明纂輯《朱子晚年定論》的歷史背景，於是，評判《朱子晚年定論》實是一部論戰遊戲之作，表面上推崇朱子「晚年」之論，消泯「朱陸異同」，實際上卻意在否定朱學，尊崇陸學，隱然帶有戲謔朱子、嘲諷尊朱世儒之意味。見東景南，《陽明大傳：「心」的救贖之路》(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20)，頁726-729。

力，卻反而加劇了「朱陸異同論」的爭議與衝突，在此之後，不乏直接針對王陽明《朱子晚年定論》一書予以強烈抨擊的論著，上文所引《學部通辨》、《考正朱子晚年定論》等著作皆是這種立場。然而反面觀之，若謂明代中葉（十六世紀）以降，是陽明學興盛、「良知」學說躍為學術主流的時代，則在這些眾多的「朱陸異同」論著中，如果要舉出贊同或輔翼王陽明《朱子晚年定論》之作的論著，卻多半僅能以遲至十八世紀，清朝中期李紱的《朱子晚年全論》一書為代表。難道在這約莫兩百年的時光之中沒有任何一部認同或承續陽明之說的作品出現嗎？

日籍學者永富青地曾發現兩種三卷單行本《朱子晚年定論》留存於世，研究後指出：在隆慶六年（1572）謝廷傑（1529-?）刊刻《王文成公全書》，將僅一卷的《朱子晚年定論》收入書中卷三〈傳習錄〉下卷後方作為「附錄」以前，編成於正德十年（1515）的《朱子晚年定論》一書長期都是以單行本的型式刊刻流傳；而陽明的高足錢德洪（緒山，1496-1574）更曾經在嘉靖三十一年（1552）增錄三十八則朱子的書信、學記等文章，將《朱子晚年定論》擴編為三卷本加以刊行，七年後（嘉靖三十八年〔1559〕）復於懷玉書院再度重刻刊行乙次。由此可見，縱使王陽明曾經明確向羅欽順（整菴，1465-1547）承認《朱子晚年定論》在文獻考證上確實存在差誤之處，但及至數十年後，王門後學之中仍然還有相當多人相信並支持王陽明《朱子晚年定論》的論點。⁵與此相仿，吉田公平在考察陽明《朱子晚年定論》在明、清兩代「朱陸論爭」之學術思潮中的意義時，也留意到陽明門下學者多有重新編纂朱子文獻選輯之舉，其中最顯著的例子就屬張元忭（陽和，1538-1588）所編的《朱子摘編》一書，該研究通過張元忭文集中留存的〈自序〉與楊起元（復所，1547-1599）文集中的〈跋〉文，乃至兩人與時人往還論學的書札，說明《朱子摘編》之作乃是結合陽明的《朱子晚年定論》及其所選錄《悟後詩》兩者彙編而成。⁶然而，或許是未得觀覽該書，吉田先生的研究對於這本書的實際內容未有著墨，殊為可惜。

⁵ 永富青地，〈關於《朱子晚年定論》的單行本〉，《故宮學術季刊》，26：2（2008），頁 89-103；永富青地，《王守仁著作の文献学的研究》（東京：汲古書院，2007），頁 245-256。

⁶ 吉田公平，《陸象山と王陽明》（東京：研文出版社，1990），頁 238-245。

不過，據此已可推想張元忭的《朱子摘編》一書正可作為在王陽明之後、清代李紱之前的一部認同並延續陽明之說的代表性例證，且該書目前恰有一海內外罕見之善本收存於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中，⁷筆者以為透過對此書的分析與探討，適足以豐富我們對明代朱陸異同論史的認識，尤其是陽明學陣營這一方的學術觀點，同時也能夠提供我們另一個別開生面的認識或詮釋朱子學的新面向與視野。

底下，擬先從張元忭編纂《朱子摘編》一書的動機與目的展開討論；繼之，考究分析該書的具體內容，說明他如何經由選編朱子的詩文作品輔翼並印證王陽明「朱子晚年另有悔悟」之說，進而討論其做法成功與否？能否經得起考驗檢證？且該書的編輯與重刊距離陽明輯成《朱子晚年定論》業已超過一甲子，則張元忭對於朱子的理解與認識，是否也有新的開展呢？

一、《朱子摘編》的纂輯、序定與重刊

張元忭，字子蓋，號陽和，浙江山陰人，生於明嘉靖十七年（1538），卒於萬曆十六年（1588）。

先祖為古劍州綿竹（今四川）人，後遷入浙江地區，十傳為張天復。天復，字復亭，號內山，又號初陽，為張元忭之父。張天復於嘉靖二十六年（1547）中進士，歷任吏部主事、湖廣提學、雲南按察司副史等職。張元忭自幼聰慧，愛好讀書。年幼時曾隨父親往赴京師，增廣其見聞，因而亦好論國事、品評人物。隆慶二年（1568），是時張天復雖已改任湖廣，卻因朝廷追究原任雲南副史時的過失，強行逮送至雲南對質。張元忭乃萬理護行，四處奔走，往還雲南與京師兩地白冤，孝行感人，其父終得削籍而歸，卻也導致元忭年初逾三十而鬢髮盡白。隆慶五年（1571），元忭以廷試第一，高中進士一甲狀元，官授翰林院修撰。後歷任會典纂修官、經筵展書官、左春坊左諭德、經

⁷ 審查人指出此《朱子摘編》一書，除有一珍本收存於傅斯年圖書館外，另見藏於日本島根大學圖書館。感謝審查人提供相關書訊！唯島根大學尚未提供數位圖書（全文）檔案，因此，僅能留待他日查核兩書版本異同（島根大學網頁上雖標示該書版本為萬曆十八年本，但該書同樣收錄有萬曆四十二年畢懋康所作〈朱子摘編序〉，推測兩書或同屬重刻本）。

筵講官等職，終卒於任上，享年五十一歲。張元忬生有二子，長子張汝霖（兩若，?-1625）、次子張汝懋（1574-1632）俱進士出身，其曾孫張岱（陶庵，1597-1684）更是明末清初著名的文人雅士。⁸

在學術思想方面，⁹張元忬則為浙中王門王畿（龍溪，1498-1583）之嫡傳弟子，黃宗羲（梨洲，1610-1695）《明儒學案》言：「先生之學，從龍溪得其緒論，故篤信陽明四有教法。」¹⁰此說或根本於張元忬有言：「謂良知有善無惡則可，謂良知無善無惡則不可。致知之功，全在察其善惡之端，善必充，惡必克，以求快足于己，方是實學。」¹¹由此不難察見，張元忬與其師所倡「四無」的學說觀點，已微有差異。張氏致書同門周汝登（海門，1547-1629）說：「大抵近時之弊，徒言良知而不言致，徒言悟而不言修。僕獨持議，不但曰良知，而必曰致良知；不但曰理以頓悟，而必曰事以漸修。蓋謂救時之意，丈謂若何？」¹²可見他的學問觀點多站在反省時俗所論之「良知」說所可能產生的流弊之角度，提出針貶、修正與補充。¹³不過，對於陽明所提出的「致良知」學說，張元忬則是推崇備至，如謂：「陽明先生於詞章訓詁之後，揭出『致良知』一言以示人，真是千古之秘傳，入聖之捷徑。」¹⁴也就在這種學問觀點與立場下，張元忬同樣認同王陽明的「朱子晚年另有悔悟」之說，朱賡（金庭，1535-1608）撰作張元忬〈行狀〉云：元忬「有言『朱、陸之學本同一源，後人妄以意見分門戶，滋生異議。』乃取朱子詩文，摘其與文成合旨者彙成一書，曰《朱子摘編》」。¹⁵是以，乃有《朱子摘編》之作。

⁸ 呂允在，〈明代浙江山陰世家張元忬的文人生活與著述〉，《藝術學報》，81（2007），頁 249-271。

⁹ 張克偉，〈論浙中王門學者張元忬之思想內涵與學術傾向〉，《哲學與文化》，18：10（1991），頁 916-932。

¹⁰ [明]黃宗羲，《明儒學案》，收入[明]黃宗羲著，吳光、沈善洪主編，《黃宗羲全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冊 7，卷 15，〈浙中王門學案·五〉，頁 369。

¹¹ [明]張元忬撰，錢明編校，《張元忬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卷 4，〈寄馮緯川〉，頁 93。

¹² [明]張元忬，《張元忬集》，卷 5，〈寄周海門〉，頁 153。

¹³ 荒木見悟，〈明儒張陽和論：良知現成論の一屈折〉，《哲學年報》25（1964），頁 97-136。

¹⁴ [明]張元忬，《張元忬集》，卷 4，〈再寄徐魯源〉，頁 113。

¹⁵ [明]朱賡，〈明奉直大夫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院侍讀陽和張公行狀〉，收入[明]張元忬，《張元忬集》，卷首，頁 11。

察傅斯年圖書館所藏張元忬《朱子摘編》一書，為萬曆四十二年（1614）重刻本，書前有張元忬作於萬曆十六年（1588）的〈朱子摘編序〉，署年萬曆四十二年畢懋康（孟侯，生卒不詳）所作的〈朱子摘編序〉以及楊起元的〈跋朱子摘編〉。書末則書有「萬曆戊子春後學山陰張元忬選評」，「歸善楊起元參閱」，「耒陽曾鳳儀、于賓程夢暘、公望程夢熊校梓」之編校梓刊記錄。¹⁶

《朱子摘編》全書分為上、下兩卷，上卷標名「晚年定論」，收存王陽明《朱子晚年定論》一書，含陽明書於正德十年（1515）的〈序〉文，以及朱子書信選摘三十一則（原書有三十五則，《朱子摘編》少錄四則文獻）與張元忬的短評「案語」十條。¹⁷下卷標名「悟後詩」，選錄朱子詩作九十四首（依詩題名，計數為五十一篇，詩名微有刪改），間雜編者「案語」十二條。

底下，先以張元忬所著自序觀其纂輯之始末，文曰：

考亭朱子之學，蓋得之延平、豫章，以遡龜山，而上接周、程之緒，其統系之相承，若此其正也。乃世之號為朱學者，往往得其膚而未窺其髓，是以馳驚於考索，而不知吾心有不慮之知；拘泥於格式，而不知吾心有天然之則，斯豈善學考亭者哉？陽明先生首揭致良知之旨以救其弊，而當時驟聞之者，輒以其畔於考亭而攻之。惟陽明亦有不自安者，乃取考亭之書而檢求之，咀其華，鈎其玄，輯為《晚年定論》。自《定論》出，而後考亭之學其精髓始透露於此。其拳拳於培本原，收放心，居然延平之家法也，而後考亭之學始為質之濂洛而無疑。是陽明不唯不畔於考亭，抑亦有功於考亭者也。¹⁸

首段在肯定朱子承繼周敦頤（1017-1073）、二程（程灝〔1032-1085〕、程頤〔1033-

¹⁶ 審查人指出在地方志中，或有語及《朱子摘編》一書為張元忬與曾鳳儀師徒兩人共同修訂者，如〔清〕張奇勛、〔清〕周士儀纂修；〔清〕譚弘憲、〔清〕周士儀續修，〔康熙〕《衡州府志》（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8），卷16，〈人物·耒陽·曾鳳儀〉，頁509。又曾氏也刊刻過一些佛典，似與本書中強調朱子晚年「兼容佛老」一特點相合。筆者感謝審查人指出這點細節，唯在相關的文獻紀錄中（如序、跋文字等），均未見將曾氏並列編者之說，故特誌於此，以備一說，以待後日續考之。

¹⁷ 缺錄四則文獻一問題，下文將有所討論與說明。

¹⁸ 〔明〕張元忬，《朱子摘編》（臺北：傅斯年圖書館藏，萬曆四十二年重刻本），卷首，〈朱子摘編序〉，頁1a-2b。另見〔明〕張元忬，《張元忬集》，卷2，〈朱子摘編序〉，頁40-41。

1107))、楊時(1053-1135)、羅從彥(1072-1135)、李侗(1093-1163)一脈而來的學術正統性之餘，更反省到世間號為遵奉朱子之說的學者，卻往往只窺見朱子學說的表面，而未能掌握其精髓奧旨，以致於專務鉅訂考索之功，拘泥於俗套格式之習，而不知吾心自有不學不慮，而能明辨是非、判別善惡的天然之則與良善之知能。接著言到陽明先生有鑑於此，特揭示「致良知」之說以救正誤解朱子之弊，然當時之士初聞乍睹之際，有所未曉，便每每以為其說違叛朱子之論，甚而鳴鼓攻之。因此，陽明乃取朱子之書含英咀華，鉤玄擇要，纂輯成《朱子晚年定論》一書，使朱子淵源於師門李延平之教，而拳拳懇切於培養本根、收攝放心的學問精華得以重新彰顯於世。故由陽明《朱子晚年定論》一書可證其不僅沒有叛離朱子之道，更可說是有功於朱子之學。

從上面的論述，不難看出張元忬對陽明所輯《朱子晚年定論》的肯認與推崇，也同時顯示出他對於朱子學的理解，更是這般帶有心學（或者說是陽明學）色彩的面貌，而這種理解觀點的由來，不僅是得乎《朱子晚年定論》，也本於他自己個人的學習體會，在自序中，他說：

忬少也讀《大學》「格致」章補，則掩卷而思曰：何哉？無乃倒言之也乎？無亦曰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而後庶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乎？果若所言，何以為知本也？稍長，得《大學》古本讀之，而後知聖人之學固如是乎易簡而無難也。已又得《定論》讀之，而後知考亭之學其究竟固若此，而傳注所云乃其論之未定者也。¹⁹

張元忬回憶其年少時對於《大學》「格致補傳」的說法曾感到大惑不解，蓋朱子有言：「一旦豁然貫通焉，則眾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²⁰張元忬以為依此語序，恐怕顛倒了「心／物」的本末次序，因為只有本於吾心之明，始得全覽眾物表裏精粗之貌。待稍長，得《古本大學》而讀之，乃知聖人之學簡易直捷，當無工夫、理論之曲折。之後，復得《朱子晚年定論》一書，方明白朱子學說之真相，章句傳注所言實為其中未定

¹⁹ [明]張元忬，《朱子摘編》，卷首，〈朱子摘編序〉，頁2b-3a。

²⁰ [宋]朱熹，《大學章句》，《四書章句集注》，收入[宋]朱熹著，朱杰人、嚴佐之、劉永翔主編，《朱子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冊6，頁20。

之論。獲此見解後，往昔的困惑終得解決。準此以讀書，多獲穎悟，張元忭續言：

已又每誦《性理》所載考亭詩，則躍然曰：此非《定論》之餘響乎！如曰：識東風面、聞夜半雷、春水生而蒙衝自在、風浪息而山樹依然。此非以神遇不以言解者乎？頃邸舍多暇，復取集中諸詩，偕一二友朋遍閱之，得其調之同者凡若干首，類而錄之，曰《悟後詩》。蓋《定論》雖曰晚年，猶有未必晚年之疑，而是詩見於平時，則皆到岸棄舟之句。合書與詩觀之，而考亭之學益見其博大圓融，洞朗無礙，前陸後王，氣求聲應，無復異同之紛紛矣。於是合二編而刻之，曰「朱子摘編」，而敘其始末如此。嗚呼！道一而已矣，學不會於一，非學也。是編也，豈獨三先生之學可會於一，即千古聖學之正傳，吾知其無二徑矣，雖謂之「儒宗參同契」可也。²¹

在掌握《朱子晚年定論》所呈顯的朱子學樣貌後，張元忭復察覺《性理大全書》所載朱子詩篇，竟與《朱子晚年定論》若合符節，這一發現，令張元忭倍感振奮。繼之，乃利用家居之暇，擇取朱子文集中與之同調的詩作，採錄類聚，合為一編，依《朱子晚年定論》所錄存者為朱子晚年悔悟之文一義，取名曰「悟後詩」。就此而論，張元忭繼續申述：他知曉《朱子晚年定論》所採錄之文，或有未必盡屬「晚年」之作的質疑，但是朱子的詩作成於日常體悟之吟哦，其所選者俱以有所悔悟的「到岸棄舟之句」為準則。如是，合《朱子晚年定論》之文（書信）與「悟後詩」並觀，則朱夫子之學的博大融通、洞徹無礙，將可全幅朗現。而與朱子同時的陸九淵（象山，1139-1192）乃至後繼者王陽明，均可見彼等同氣相求、同聲相應之處，而無復再有異同之糾紛。所以，彙合陽明的《朱子晚年定論》與張元忭所選朱子「悟後詩」，總名為「朱子摘編」。最後，張元忭更表達他對此書抱有極高的自我評價，認為此作不僅令朱、陸、王三人之學總匯歸一，更是代表「道一而已矣」的千古聖學之正傳，直可謂之「儒宗參同契」也。

至此，可以明白張元忭所輯《朱子摘編》一書的始末，他的纂述立場明

²¹ [明]張元忭，《朱子摘編》，卷首，〈朱子摘編序〉，頁3a-4b。

顯是站在王陽明《朱子晚年定論》一方的，而有意幫助此作化解「朱陸異同」論爭中的質疑與非難，其做法略同於錢德洪將此書從一卷本增補為三卷本的「擴編文本」方式，只是他所增補引證的材料，來自朱子的詩作，而非書信。且在上面引文中，還透露了兩點有趣的訊息：第一點是《性理大全書》所錄存的朱子詩篇，在張元忭的眼中，被視為「《定論》之餘響」，這又是怎麼回事呢？筆者細察《性理大全書》卷七十所收存的朱子詩作，²²發現其中僅有極少數的篇章（四首作品）被排除在外，如〈白鹿講會次卜文韻〉、〈詠開窗〉等，其餘絕大多數的作品，悉數收錄於《朱子摘編》之中。以數量統計言，《性理大全書》中高達十四首（組）詩作被錄入《朱子摘編》中，超過下卷《悟後詩》選目的「四分之一」份量，據此而言，或可謂《性理大全書》所選朱子詩作，被張元忭取之為《朱子摘編》下卷《悟後詩》的基礎選文。

除了選文的來源立基於具有權威性的《性理大全書》外，第二點，張元忭還特別表明其編選朱子詩篇的過程，曾「偕一二友朋遍閱之」，表示這個詩選集不是他個人的觀點或意見而已，而是經過學術討論，具有公信力的作品。但問題是：何人曾經參與過討論呢？筆者以為替《朱子摘編》寫作〈跋〉文的楊起元就是重要的討論人之一，蓋《楊復所先生家藏文集》中錄存有〈復張陽和先生示朱子悟後詩〉一文，文曰：

先生此編實與文成公意緒相承，有功於道脈甚大，非特朱子賴以表章而已。〈感興詩〉真雄偉特達，今在選者，違道不遠，獨「飄飄學侶」、「西方論緣業」二篇立義未精，似可刪也。〈酬南軒〉篇云：「惟應酬酢處，特達見本根。萬化自此流，千聖同茲源。」是徹底透悟。〈歲寒軒〉一篇，亦有意，末云：「明朝猿叫三峽路，一葉徑上滄浪船」，可謂坐脫。七言律未見到家，而〈和陸子壽〉者正屬影響，所謂入門未得時也，似亦宜刪去。七言絕「古鏡重磨」篇，先生批云：「後儒以并州為先生故鄉，誤矣。」此語正繼往開來手段，妙甚。「昨日土墻」一首，亦未見性，刪之可也。通塞、明暗、往來之狀，乃人自見得恍惚

²² [明]胡廣等奉敕撰，《性理大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卷 70，〈詩·古選〉、〈律〉，頁 514-526。

有此，其實非心也。若見心者，即此便是心，何通塞、明暗、往來之有。此毫釐之辨，不能無疑者。謹此復教，惟尊裁以為何如。²³

在肯定《悟後詩》的編纂有功於承繼並顯揚王陽明（文成公）《朱子晚年定論》之用心以外，楊起元更仔細的對其中的選編作品詳加討論，坦白直陳肯定或當刪改之批判性建言，其詳加討論的作品有六，其中〈酬南軒（案：原詩題作「二詩奉酬敬夫贈言并以為別」）〉、〈歲寒軒（案：原詩題作「奉同公濟諸兄自精舍來集冲佑之歲寒軒因邀諸羽客同飲公濟有詩贈守元章師因次其韻」）〉、「古鏡重磨」篇（案：應是〈送林熙之詩·其五〉）這三首詩作，楊起元是贊同的，因為這些詩作，或表現出朱子的「徹底透悟」；或超脫生死而自在，別有意蘊；或如張元忭的案語「先生既已到家，而後儒更以并州為先生故鄉，誤矣！」²⁴畫龍點睛地指出朱子此刻的悟境是內心光明朗照，直探本源，所謂「明明直照吾家路」，而世儒卻一味向外求索，誤指「并州作故鄉」，故楊起元盛讚此批語能繼《朱子晚年定論》之奧旨以示來學一坦途，「妙甚！」相反地，〈齋居感興二十首〉之作雖多半意境雄偉，辭義特達，然其中第十五首「飄飄學仙侶」、第十六首「西方論緣業」則多雜有佛、道兩教之色彩，以致立意不甚精當，應可刪去。〈鵝湖寺和陸子壽〉一作品，雖有「舊學商量加邃密，新知培養轉深沉」的名句，但此時朱子的觀點仍處於受到「鵝湖之會」的衝擊，僅是揣摩影響，工夫恐不夠切實，因此，似不宜列為「悟後」詩篇。至於「昨日土墻」這首作品（案：即〈次范碩夫題景福僧開窗韻〉一詩），²⁵竟然稱述：「此心若道無通塞，明暗何緣有去來？」便是以時而或有通塞、明暗、往來之情狀言心，而不明瞭若欲言「心」者，則當下日用平常，真實活潑的生命流露就是吾人之「心」的真貌，是以，這首詩於義理上有根本的錯誤，「刪之可也！」

從這個討論，可以看到張元忭初步完成《悟後詩》的選摘與批註後，曾見示於楊起元，並邀其討論、提供意見。若對照現存萬曆四十二年重刻的《朱子摘編》一書來看，楊起元的刪改建議最終僅獲得張元忭的部分採納，他所

²³ [明]楊起元，《續刻楊復所先生家藏文集》（臺南：莊嚴文化事業公司，1997），卷6，〈復張陽和先生示朱子悟後詩〉，頁310。

²⁴ [明]張元忭，《朱子摘編》，卷下，〈悟後詩〉，頁16b。

²⁵ [宋]朱熹，《朱文公文集》，收入[宋]朱熹，《朱子全書》，冊20，卷10，〈次范碩夫題景福僧開窗韻〉，頁547。

建議刪去的〈齋居感興〉第十五、十六首與〈鵝湖寺和陸子壽〉仍然保留在《悟後詩》中，但是「昨日土墻」這首詩作，確實未見收存於《朱子摘編》之中，可見這點建議，應該得到張元忬的認同，因而汰除了這首作品。且關聯到前一點來看，這首詩作卻又錄存於《性理大全書》中，²⁶復印證前文所言，《悟後詩》的選編或是取《性理大全書》中的朱子詩篇作為基礎選文的看法。所以，《朱子摘編》一方面憑藉《性理大全書》這個具有權威性的典籍文本，一方面透過友朋的討論，來凝聚師友們的共識，並提高著作的公信力，也因此該書復委由楊起元來撰寫〈跋〉文，彼云：

張陽和先生月聯都下同志論學，每會歌「半畝」、「勝日」等什，無不興起者。先生曰：「詩至於可興，惟其言之達諸天也，非朱子悟後，何以自是？然其篇什應不止是也。」遂發其全集，得若干首，曰：「是不亦與陽明先生所輯《晚年定論》互相發明乎？」乃合為一編，題曰：「朱子摘編」。先生門人曾舜徵氏請公諸同志，乃捐己俸壽梓焉。蓋自《定論》出，而朱子之學不湮於傳註；自《摘編》出，而陽明之輯果得其精華。陽明有功於朱子，是編復有功於陽明，而為同志之助多矣。²⁷

楊起元在〈跋〉文中說明張元忬編著《朱子摘編》一書的始末，即張氏於每月定期與志同道合之士舉辦會講活動之際，皆會一同歌詠朱子的〈觀書有感〉詩（「半畝方塘一鑑開，天光雲影共徘徊。問渠那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或者〈春日偶作〉（「勝日尋芳泗水濱，無邊光景一時新。等閑識得東風面，萬紫千紅總是春。」）等詩篇，參與的學者往往因此而有所感發興起。張元忬認為這正是詩歌足以興發人之志道精神的力量，且若非朱子有所體悟，其作品如何能有如許的生命力與憾動人心的力量。因此，他相信這類朱子「悟後」之詩作當不止於此，於是從《朱子全集》揀擇得若干作品。他更發覺其所為正與陽明的《朱子晚年定論》之作有相互發明、呼應補充之處，所以，才將兩者彙輯、合編為《朱子摘編》一書。準此，楊起元評議此書的價值為「自《摘編》出，而陽明之輯果得其精華」，肯定《朱子摘編》一書對於陽明《朱子晚年定論》的纂輯觀

²⁶ [明] 胡廣等奉敕撰，《性理大全書》，卷 70，〈律〉，頁 524。

²⁷ [明] 張元忬，《朱子摘編》，卷首，〈跋朱子摘編〉，頁 2a-3a。

點確有輔翼之效，這正是張元忭有功於陽明學的推廣、流佈，以及多所裨益於陽明學人之處。

由此可見該書符合時代思潮的需求，曾獲得陽明學者們的支持與肯定，應有相當程度的流通性，而這一點也同時表現在此書的兩篇「重刊」序文之中。

現存《朱子摘編》一書中錄有序定於萬曆四十二年畢懋康（孟侯，生卒不詳）所作的〈朱子摘編序〉，可見該書在張元忭編輯完成，其門人曾鳳儀（舜徵，萬曆十一年進士）刊行後的廿餘年之後，又有再度重刊的情況存在。猶有甚者，我們還可以查找到另一篇〈重刻朱子摘編序〉，文中作者表示其刊刻始末如下：

是編也，陽和先生長令君雨若公來蒞敝邑，出以示予，且欲重刻而惠之後學，可謂守其家承，而盡心於朱學者矣。²⁸

此文作者劉文卿（生卒不詳），字倬如，為萬曆十七年（1589）進士，其撰作此文的因緣是基於作者張元忭的長子張汝霖登門拜訪，出示該書，表達有意重刻以嘉惠學子，於是劉文卿撰文讚其不僅能克紹其裘，復有功於朱子學真貌的傳佈。又考劉氏生平，得知其入仕為官不久，旋即辭世，享年僅三十三歲。²⁹由其早逝復可推斷，這次的重新刊行當在萬曆四十二年之前，可見在張元忭、楊起元兩人寫作序跋文字之後，《朱子摘編》一書至少曾經刊刻過兩次，這代表雖然王陽明的《朱子晚年定論》飽受質疑與批評，但在「朱陸異同論」甚囂塵上的十六至十七世紀，作為支持一方，承繼陽明之說的《朱子摘編》一書在當時學界仍有相當程度的支持度與流通性。³⁰

²⁸ [明]劉文卿，《新刻劉直洲先生文集》（臺南：莊嚴文化事業公司，1997），卷1，〈重刻朱子摘編序〉，頁408。

²⁹ [清]劉鐸、[清]趙之謙等纂，[清]曾國藩、[清]劉坤一等修，[光緒]《江西通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卷155，〈列傳·建昌府·劉文卿〉，頁34-35。

³⁰ 論文審查人點出考察《朱子摘編》之刊行與重刊時間之現實因素的提醒，並補充薛應旂（方山，1499-1574）於嘉靖三十一年也有〈重刻朱子晚年定論序〉之作，見[明]薛應旂，《方山先生文錄》，（臺南：莊嚴文化事業公司，1997），卷9，頁322-323，可見當時的陽明學者始終感受到學界對陽明學說的質疑與挑戰，故有重刊這些書籍之舉。感謝審查人提供資料的補充，謹誌於此，以致謝忱。

在說明完張元忬《朱子摘編》一書的纂輯目的、序定歷程與刊版流通情形後，接著，讓我們進入到該書的內部，觀察分析此書如何支持王陽明的《朱子晚年定論》之作，其做法是否成功、有效，又突顯出怎樣的理理解特色。

二、《朱子摘編》的內容評析

誠如上文所言，《朱子摘編》乃由上卷——王陽明編著的《朱子晚年定論》與下卷——張元忬選編的《(朱子) 悟後詩》兩部分彙合而成。

(一) 上卷以案語申述《朱子晚年定論》的論點

於上卷《晚年定論》方面，陽明原編輯此書時，合計節錄朱子書信三十五函，³¹然而張元忬在《朱子摘編》中卻獨漏了第二十九則、三十則、三十一則、三十二則這四封文書，³²何以如此？查閱全書，實未見有任何說明（該書無缺頁）。又倘若考量他是否因為《朱子晚年定論》在當時已為羅欽順與陳建等人明白指斥其所收錄者有非「晚年」之作，³³因而刻意有所刪削，以杜悠悠之口？然則這四封書函卻非《朱子晚年定論》在文獻引證上確實存在差誤之作，是以，張元忬何以要略過這四則文獻，原因仍有待查明。

再者，張元忬對《朱子晚年定論》提出十則「案語」形式的短評，則頗可見其指引讀者掌握《朱子晚年定論》之要旨，如針對第十九則〈答梁文叔〉

³¹ 本文對《朱子晚年定論》所錄朱子文獻的編號，參考陳榮捷，《王陽明傳習錄詳註集評》（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2），頁 422-435。然該書標號為三十四，實則第三十一函，包括兩封〈答呂子約〉書，應別立為兩封信函，故總計三十五函書信。

³² 分別是第 29 則：〔宋〕朱熹，《朱文公文集》，收入〔宋〕朱熹，《朱子全書》，冊 21，卷 35，〈與劉子澄〉書十四（使至，辱誨示），頁 1552；第 30 則：〔宋〕朱熹，《朱文公別集》，收入〔宋〕朱熹，《朱子全書》，冊 25，卷 6，〈林擇之〉書三（某憂苦如昨），頁 4941；第 31 則：〔宋〕朱熹，《朱文公文集》，收入〔宋〕朱熹，《朱子全書》，冊 22，卷 48，〈答呂子約〉書七（示喻日用工夫），頁 2212-2213。

³³ 羅欽順指出《朱子晚年定論》中所收〈答何叔京〉四書函（分別為第 3、22、23、24 則）非朱子「晚年」之作；而陳建則在此四書信之外，復力辯〈答張敬夫〉與〈答林擇之〉（第 12、18 則）等信函也非屬朱子「晚年」之作。相關研究見游騰達，〈論朱澤溪《朱子聖學考略》對「朱陸異同論」的文獻探析〉，《東華漢學》，14（2011），頁 122。

書，³⁴評為「此書最警切，是先生最得力處」。³⁵與此評相呼應，楊起元的〈跋朱子摘編〉也表示：

是編載〈答梁文叔書〉云：「孟子道性善，稱堯舜，是第一義。若於此信得及，直下便是聖賢，更無一毫人欲之私。若信不及，孟子又說個第二節工夫，引成鬮、顏淵、公明儀之言，教人如此發憤，勇猛向前，此外更無別法。」此殆晦翁一生為學履歷公案哉！……迨其晚年，翻然有覺，恍然自失，而曰：「此與守書冊、泥言語，全無交涉。知此則知仁矣。」又其詩曰：「惟應酬酢處，特達見本根。」曰：「等閑識得東風面，萬紫千紅總是春。」所謂信得性善及，直下便是者，非耶？³⁶

為什麼這封書函被張、楊兩人特別看重呢？因為在該書信中，朱子明白標舉出孟子的第一義工夫為對於吾人本性之善，能夠當下加以肯認與信持（「信得及」），若能如此，則即刻便可達到生命的純粹化（「無一毫人欲之私」），便是聖賢心境的體現。這也是朱子晚年悔悟「守書冊、泥言語」，³⁷實無關乎道德修養、實踐的核心觀點。同樣地，為《朱子摘編》所收錄的朱子的詩作「惟應酬酢處，特達見本根」與「等閑識得東風面，萬紫千紅總是春」，³⁸不正也顯示出能夠體證並信持「性善」之說，則舉凡日用平常的酬酢應對，耳聽目視所及的自然風光，無非都是春生之機、大化流行的本根——「天道」之展現。與此相對應的，張元忬在《朱子摘編》中，於後一詩句下也同樣有一案語：「東風面，常在目前，默而識之，頭頭是道。」³⁹

除此一例外，張元忬還在上卷《晚年定論》第十則〈答呂子約〉與第十二則〈答張敬夫〉後，有如下之兩案語：

³⁴ [宋]朱熹，《朱文公文集》，收入[宋]朱熹，《朱子全書》，冊22，卷44，〈答梁文叔〉書三（示喻所處），頁2026。

³⁵ [明]張元忬，《朱子摘編》，卷上，《晚年定論》，頁14b。

³⁶ [明]張元忬，《朱子摘編》，卷首，〈跋朱子摘編〉，頁1a-2a。

³⁷ [宋]朱熹，《朱文公文集》，收入[宋]朱熹，《朱子全書》，冊22，卷40，〈答何叔京〉書十三（今年不謂饑歉至此），頁1826。《朱子晚年定論》列為第3則。

³⁸ 此兩詩句出自[宋]朱熹，《朱文公文集》，收入[宋]朱熹，《朱子全書》，冊20，卷5〈二詩奉酬敬夫贈言并以為別〉，頁387；同書，卷2，〈春日〉，頁285。且俱收入[明]張元忬，《朱子摘編》，卷下，《悟後詩》中，分別為第16首與第53首詩作（關於《悟後詩》所收錄詩作之編號為作者所加，請參見本文附錄）。

³⁹ [明]張元忬，《朱子摘編》，卷下，《悟後詩》，頁15a。

先生晚年誨人每拳拳於立本，如此然，則講論討求抑末矣！⁴⁰

切近、分明處，正聖學之要。先生一旦豁然，頓舍舊見，且自謂解經不如漢儒之訓詁，非大智大勇，其能然乎？⁴¹

前一段是承朱子書中有「嚮來誠是太涉支離」的省思，又言道：「蓋無本以自立，則事事皆病耳。……又聞講授亦頗勤勞，此恐或有未便。今日正要清源正本，以察事變之幾微，豈可一向汨溺於故紙堆中，使精神昏弊，失後忘前，而可以謂之學乎？」⁴²因而指明朱子晚年每每勸勉人當以「立大本」為先，而勿使精神沉湎於讀書博覽的「支離事業」之中。至於後一段所言直是「聖學之要」的「切近、分明處」，則是基於朱子予張栻（南軒，1133-1180）的書信中提到「讀書反己，固不無警省處，終是旁無彊輔，因循汨沒，尋復失之」的深刻感受，因而有「近日乃覺其非，此正是最切近處、最分明處」的幡然醒悟。朱子同時也反省到自己「平日解經最為守章句者，然亦多是推衍文義，……下梢看得支離，至於本旨，全不相照」，⁴³故自認連漢儒的訓詁工夫都有所不及。於是張元忭認為從此處正可看到朱子一旦豁然悔悟，便能夠頓捨舊見的大智大勇，正如同在第十七則〈答林擇之〉書，朱子自陳其悔悟之深刻，甚至達到「不知所以措其躬也」的程度，⁴⁴所以，張元忭在此則下一評註：「先生所不可及，卻正在此。」⁴⁵

從這幾個例子，可以觀察到張元忭在《朱子摘編》中用精簡扼要的評語點出陽明編纂《朱子晚年定論》的根本用心，即旨在陳表：朱子晚年自悔支離，不再以讀書探求、考索文義為學問工夫，而改以信守「性善」為吾人所

⁴⁰ [明]張元忭，《朱子摘編》，卷上，《晚年定論》，頁8b。

⁴¹ [明]張元忭，《朱子摘編》，卷上，《晚年定論》，頁10a-b。

⁴² [宋]朱熹，《朱文公文集》，收入[宋]朱熹，《朱子全書》，冊22，卷48，〈答呂子約〉書三（日用功夫），頁2208-2209。

⁴³ [宋]朱熹，《朱文公文集》，收入[宋]朱熹，《朱子全書》，冊21，卷31，〈答張敬夫〉書十八（熹窮居如昨），頁1349。這封書函，據當代研究的考證，當寫作於淳熙二年（1175），朱子46歲之時，不宜作為晚年思想的材料。見陳來，《朱子書信編年考證（增訂本）》（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7），頁135。

⁴⁴ [宋]朱熹，《朱文公文集》，收入[宋]朱熹，《朱子全書》，冊22，卷43，〈答林擇之〉書十（熹哀苦之餘），頁1969。

⁴⁵ [明]張元忭，《朱子摘編》，卷上，《晚年定論》，頁13a。

當優先挺立之「大本」，依此，更可以當下即是聖賢的自我肯認作為修養工夫之進路。

除此之外，更加重要的是張元忬還希望為讀者們明白指出如其在〈朱子摘編序〉中所言「三先生（筆者案：即朱子、象山、陽明）之學可會於一」的根本觀點。如在上卷《晚年定論》第八則〈答陸象山〉一書函下，張氏「案語」云：

觀此，則先生於象山已自無異同矣，後人尚嘵嘵然為之分疏，不為二先生所笑耶？⁴⁶

為什麼在這封書信中，能夠看出朱子坦言已與象山之間不復存在矛盾、異同呢？因為朱子在信中說道：「所幸邇來日用工夫頗覺有力，無復向來支離之病。甚恨未得從容面論。未知異時相見，尚復有異同否耳？」⁴⁷基於這則朱子的自我表述，張元忬乃強調朱、陸之間實不再有衝突，而可會通為一了，至於後人嘵嘵不休，勤於分辨兩人之殊異與優劣，豈不是庸人自擾，畫蛇添足之舉？

由張元忬的十條案語短評來看，他最致力於宣揚並點醒讀者的是陽明之學說與朱子學問的一致性，所以，其中高達四則案語都意在表達這個論點，記述如下：

「涵養本原而察於理欲之判」，陽明先生「格物」之旨正如此，若曰「窮致事物之理」，則不可謂知本矣。⁴⁸

「氣習偏處、意欲萌處」，人倫日用最切近處，如此用功，誰謂朱、王有異同邪？⁴⁹

忬嘗疑文公之學與師門宗旨相背，今觀此書，乃知先生已自道破，世儒不察耳。⁵⁰

延平教人觀未發以前氣象，考亭初未深解，而後往往追憶，畢竟得力

⁴⁶ [明]張元忬，《朱子摘編》，卷上，《晚年定論》，頁7b。

⁴⁷ [宋]朱熹，《朱文公文集》，收入[宋]朱熹，《朱子全書》，冊21，卷36，〈答陸子靜〉書二（昨聞嘗有巧外之請），頁1564-1565。

⁴⁸ [明]張元忬，《朱子摘編》，卷上，《晚年定論》，頁4b。

⁴⁹ [明]張元忬，《朱子摘編》，卷上，《晚年定論》，頁13b。

⁵⁰ [明]張元忬，《朱子摘編》，卷上，《晚年定論》，頁15b。

在此。陽明〈修道說〉謂：慎獨後乃有中和，固與延平不謀而合者。⁵¹第一條案語是針對朱子〈答呂子約〉書言：修養工夫之要在於「涵養本原而察於天理人欲之判，此是日用動靜之間，不可頃刻間斷底事」，⁵²因此，張元忬認為此說與陽明的「格物」之論可有相通之處。而朱子此時特別倡議此「涵養本源」的工夫，同時反顯《四書章句集註》中的「格物窮理」之說，實為中年未定之論，⁵³若仍揭舉此說欲以突出陽明與朱子的距離，便非「知本」之論了。第二條案語，則是朱子言其近日體會所得：「日用之間，常切檢點氣習偏處、意欲萌處，與平日所講相似與不相似，就此痛著工夫，庶幾有益。」⁵⁴據此以觀，則朱子、陽明庶幾無別。然筆者以為，這是儒學修養工夫論的基本通則，實不足作為學說系統區判的準據。至於第三條、第四條案語都是剋就李延平「觀喜怒哀樂未發氣象」一工夫而發的，然張元忬的說法，稍嫌曲折，即他認定這兩封書信中朱子雖痛陳自己早年對師門教旨多有未契，⁵⁵一說「辜負教育之意」，一說「孤負此翁耳」，但是基於朱子一再表達追悔未及的憾恨，則其終究是能清楚掌握此一「龜山門下相傳指訣」的，是故，準此而論，陽明的學問宗旨實與朱子之學不相違背。而陽明的〈修道說〉亦與朱子追述延平嘗言「先言慎獨，然後及中和」之說，可謂不謀而合，此又是一旁證也。

又關於陽明之學與朱子學的相互融通性，張元忬也曾說道：

⁵¹ [明]張元忬，《朱子摘編》，卷上，《晚年定論》，頁19b。

⁵² [宋]朱熹，《朱文公文集》，收入[宋]朱熹，《朱子全書》，冊22，卷47，〈答呂子約〉書二十七（日用功夫），頁2205。《晚年定論》列為第2則，參[明]張元忬，《朱子摘編》，卷上，《晚年定論》，頁3b-4b。

⁵³ 此為陽明纂輯《朱子晚年定論》所欲表達的論點之一，見[明]王陽明，〈朱子晚年定論序〉，收入陳榮捷，《王陽明傳習錄詳註集評》，頁422。

⁵⁴ [宋]朱熹，《朱文公文集》，收入[宋]朱熹，《朱子全書》，冊22，卷43，〈答林擇之〉書二十六（此中見有朋友數人），頁1983。《晚年定論》錄序第18則，參[明]張元忬，《朱子摘編》，卷上，《晚年定論》，頁13a-b。

⁵⁵ 這兩則案語乃針對《朱子晚年定論》第22則、第33則而發，這兩則文獻分別是[宋]朱熹，《朱文公文集》，收入[宋]朱熹，《朱子全書》，冊22，卷40，〈答何叔京〉書二（熹孤陋如昨），頁1802；同書，卷43，〈答林擇之〉書二十（所引「人生而靜」），頁1979-1980。〈答何叔京〉一書當寫作於乾道二年（1166），朱子時年37歲之際，因此，實不宜作為晚年思想的材料。見陳來，《朱子書信編年考證（增訂本）》，頁37。

世之論者曰「文公之學篤於行」，不知外心無以為行；「文成之學求諸心」，不知外行無以為心。是惟善學者，即日用而著察，本妙悟以修持，則為朱、為王，雖途徑不同，其至於道也一而已矣。不然，百工各挾其藝，務以相角，而不務相濟，又豈主人之心哉？⁵⁶

張元忭認為朱子與陽明兩人雖然在契入儒學道妙的途徑、表現上有所差異，一者偏向於注重篤躬踐履，一者側重於強調反求諸心，但是，實在說來，「心」與「行」之間本是不可割裂的連動性整體，是以，即乎日用平常的躬行實踐中，當有針對本心善性的深刻省察與內在自我的掘發，又根於本心善性的體究妙契中，復該有繼之而來的堅定信守與勤勉不懈的砥礪修持，因此，兩種修養途徑看似分歧，實則兩途徑終究同樣通達於「道」，所以，「二子之說不惟不相悖，而實相濟矣，尚何辨論之紛紛哉？」⁵⁷

綜上所述，張元忭在《朱子摘編》的上卷中，於收錄陽明《朱子晚年定論》外，寫有十則批註案語，這些短評一方面複述了《朱子晚年定論》的論旨，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指明朱子、象山、陽明三先生之學當可融通為一。當然，就文獻證據而言，後一項意見，恐有過度發揮、曲解文義之嫌。⁵⁸此外，用短評案語的方式來表述見解，在觀點的完整表述與論證之精確性上，其實是有所不足的。

（二）下卷以詩選佐證《朱子晚年定論》的主張

接下來，讓我們來看《朱子摘編》的下卷《悟後詩》的部分。《悟後詩》

⁵⁶ [明]張元忭，《張元忭集》，卷7，〈修復朱文公祠記〉，頁180。

⁵⁷ [明]張元忭，《張元忭集》，卷9，〈見吾陳公傳〉，頁241。張元忭曾以「頓／漸」兩途區分象山與朱子兩人的學問差異，稱：「入聖之門，有頓、有漸。求之於心性者，是謂頓門，簡而易；求之於事物者，是謂漸門，支而難。」見[明]張元忭，《張元忭集》，卷8，〈岳麓同遊記〉，頁208。此說法明顯帶有優劣的評判；但他在另一處也曾直言「夫學有頓、漸，其至於道也，一而已矣」，則是同時肯定「頓／漸」兩途俱可共適於「道」的價值與意義，參[明]張元忭，《張元忭集》，卷2，〈崇祀疏議後序〉，頁39。

⁵⁸ 筆者的研究指出無論《道一編》或者《朱子晚年定論》之等作，多有違犯年代考證之失（非晚年之作）與錯解文義之病。見游騰達，〈論朱澤澐《朱子聖學考略》對「朱陸異同論」的文獻探析〉，《東華漢學》，14（2011），頁118-128。

計收有朱子詩作九十四首。這九十四首詩作中，有些是多首詩聯吟的套詩，如〈齋居感興二十首〉選錄其中的十五首，⁵⁹〈淳熙甲辰中春精舍閒居戲作武夷權歌十首呈諸同遊相與一笑〉十首全錄，〈讀道書作六首〉則選錄前四首等等，是以，總計應為五十一組詩作。

詩作之編排順序依詩篇體例，依序為古詩、五言律、七言律、五言絕句、七言絕句。詩名或有節略、刪修，如〈二詩奉酬敬夫贈言并以為別〉簡化題名為「酬南軒」、〈奉同公濟諸兄自精舍來集冲佑之歲寒軒因邀諸羽客同飲公濟有詩贈守元章師因次其韻〉簡稱「歲寒軒與諸羽客同飲次公濟韻」、〈列岫望西山最正殆無毫髮遺恨藤王秋屏皆不及也因作此詩二首〉改名「望西山」、〈奉答景仁老兄贈別之句〉刪改為「答景仁奉別」、〈淳熙甲辰中春精舍閒居戲作武夷權歌十首呈諸同遊相與一笑〉簡名曰「武夷權歌十首」等；或僅述小標題名，如〈墨莊五詠·玩易齋〉只作「玩易齋」、〈百丈山六詠·石磴〉僅標「石磴」、〈次呂季克東堂九詠·月臺〉只名曰「月臺」等；或因改動詩名，書中出現些微差誤，如只書小標題名的「濠上齋二首」與「閑坐」兩詩篇，實皆是〈次韻潮州詩六首〉之系列作品，不宜分開編列在第十八、十九首與第三十五首。此外，還有一處題名錯誤，第五十三、五十四首題名為「春日二首」，其實在文集中，「春日」之作僅一首，後一首則題名為「春日偶作」。因詩題的改動，於讀者或研究者而言，多有檢覈上的不便，因此，本文乃將各篇詩作復其原名，整理為文末之附錄「《朱子摘編》卷下《悟後詩》輯錄詩作繫年」。

除此之外，《悟後詩》還錄有簡短的十二則「案語」，其中第十則乃朱子詩作——〈次韻擇之餘干道中〉末尾原有之小註，即「亭下予家種麥處也」；⁶⁰第十一則亦為〈武夷權歌〉第七曲詩末原有之小注文字：「此詩後二句，一本作：『卻憐昨夜峰頭雨，添得飛泉幾道寒。』」⁶¹故真為編者張元忞之意見，可窺知其揀選該詩篇之原因者，僅有十則「案語」。

⁵⁹ 所刪節的為第5、6、7、11、12等五首作品。

⁶⁰ [宋]朱熹，《朱文公文集》，收入[宋]朱熹，《朱子全書》，冊20，卷5，〈次韻擇之餘干道中〉，頁404。《悟後詩》錄序第84首，見[明]張元忞，《朱子摘編》，卷下，《悟後詩》，頁20b。

⁶¹ [宋]朱熹，《朱文公文集》，收入[宋]朱熹，《朱子全書》，冊21，卷9，〈淳熙甲

復次，依卷名言，張元忬取「悟後詩」一名，依其所自撰〈朱子摘編序〉可知，其或有鑑於陽明《朱子晚年定論》所錄存者未必全數盡屬「晚年」之作，而多遭疵議，因此，不取「晚年」之名，但取其義，即選摘、錄存之詩作為朱子自悔支離，幡然改悟後之篇什。換言之，「悟後詩」之名雖然刻意隱沒「晚年」二字，但其承《朱子晚年定論》一書而編，特別選錄代表朱子悔悟後所得的詩作，作為輔翼陽明《朱子晚年定論》之說的佐證，故在下卷《悟後詩》的作品選編上，張元忬便特意選錄朱子對於讀書博覽工夫的屏棄，如輯〈出山道中口占〉一詩云：

川原紅綠一時新，暮雨朝晴更可人。書冊埋頭無了日，不如拋卻去尋春。⁶²

詩中直謂「書冊埋頭無了日，不如拋卻去尋春」，道出朱子在淳熙十一年（1184）於武夷山中飽覽山水風光，面對暮雨朝晴之後，一片春意盎然，滿眼新嫩的山紅柳綠，因而興起欲拋卻無有了期的讀書窮索工夫，改為由遊觀山水、倘佯於自然之境以尋求體悟妙會的感受。

從上面的詩作，可以看到朱子對於埋首書冊的做法有所警省，所謂「莫將佔畢苦沉埋」，⁶³但是，衡諸孔子研《易》之勤奮，不也達至「韋編三絕」的地步嗎？所以，張元忬選錄了〈易二首〉來回應這個問題，詩云：

立卦生爻事有因，兩儀四象已前陳。須知三絕韋編者，不是尋行數墨人。

潛心雖出重爻後，著眼何妨未畫前。識得兩儀根太極，此時方好絕韋編。⁶⁴

朱子雖有「舊學商量加邃密，新知培養轉深沉」的名句，⁶⁵但同時也有「須知三絕韋編者，不是尋行數墨人」之語，意即孔夫子雖是潛心參究於立卦繫辭

辰中春精舍閒居戲作武夷權歌十首呈諸同遊相與一笑〉，頁 526。《悟後詩》錄序第 92 首，見〔明〕張元忬，《朱子摘編》，卷下，《悟後詩》，頁 21b-22a。

⁶² 〔明〕張元忬，《朱子摘編》，卷下，《悟後詩》，第 58 首，頁 16a。

⁶³ 〔明〕張元忬，《朱子摘編》，卷下，《悟後詩》，第 42 首，頁 12b。

⁶⁴ 〔明〕張元忬，《朱子摘編》，卷下，《悟後詩》，第 56、57 首，頁 15b-16a。

⁶⁵ 〔宋〕朱熹，《朱文公文集》，收入〔宋〕朱熹，《朱子全書》，冊 20，卷 4，〈鵝湖寺和陸子壽〉，頁 365；錄入〔明〕張元忬，《朱子摘編》，卷下，《悟後詩》，第 43 首，頁 13a。

之後，「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但其用心則在探究萬物變化的根本因由與理則，實是著眼於乾坤未畫之前，故循象以究理，由爻辭卦畫上溯乎兩儀、太極，則此時正是韋編當絕之際。這裡所說的韋編之「絕」，不僅是斷絕，還可以有絕決、超越之意，正所謂「欲知陋巷憂時樂，只向韋編絕處尋」，⁶⁶換言之，孔子的「韋編三絕」並不是埋首書冊，尋行數墨而已，而是超越乎《易》書卦象文字之上，直契終極性的價值根源——太極之理。

基於上述的詮解，便可領會張元忞收錄〈齋居感興二十首〉之作，朱子坦誠自省「但逞言辭好，豈知神監昏？曰余昧前訓，坐此枝葉繁。發憤永刊落，奇功收一原」一語的原因，⁶⁷所謂當永遠刊落的「前訓」，不外乎實屬旁枝末葉的讀書博覽一事，惟「奇功收一原」又該如何解釋呢？

所謂的「發憤永刊落，奇功收一原」，一方面，可說是朱子體會到「道有默識無言傳，向來誤矣空談天。只今斷簡窺蠹蝕，似向追蠹看蟲旋。始知古人有妙處，未遽秦谷隨飛煙」。⁶⁸意即當從秦火焚書與書蠹蠶食後的斷簡殘編中抽離出來，擺脫徒守書冊、窮經考索等無益之功，如是，方知古聖先賢別有越乎語言文字之外，而默契道妙之法。所以，承上所述，更進一步言之，就是復返於自我身心的修證，因此，張元忞在《悟後詩》的編選中，收錄〈仁術〉一詩，詩曰：

在昔賢君子，存心每欲仁。求端從有術，及物豈無因。惻隱來何自？虛明覺處真。擴充從此念，福澤遍斯民。入井倉皇際，牽牛穀觶辰。向來看楚越，今日備吾身。⁶⁹

此詩乃從《孟子》一書言惻隱之仁心仁德轉化而來，詩中言往昔理想中的修德君子每每以惻隱之仁存心，更能擴充此心念，落實為具體的仁政，使福澤遍施於庶民百姓。而所謂的惻隱之仁心何在呢？便在於乍見孺子入井，而內心慌惕倉皇，必援手救助之際；見人牽牛欲宰殺之，而牛隻顫抖穀觶，令心

⁶⁶ [明]張元忞，《朱子摘編》，卷下，《悟後詩》，第66首，頁17b。

⁶⁷ [明]張元忞，《朱子摘編》，卷下，《悟後詩》，第15首，頁4b。

⁶⁸ [明]張元忞，《朱子摘編》，卷下，《悟後詩》，第30首，頁9a。

⁶⁹ [明]張元忞，《朱子摘編》，卷下，《悟後詩》，第38首，頁11b。

有所不忍之刻。凡此皆指示、啟發吾人內在「虛靈明覺」的心有所醒覺、體驗到真情實感流露之時，即是掌握仁心之端倪的下手處。且更重要的是，過去竟以為此仁心的顯現與實踐，是遠如楚越般的遙遠目標或想望終點，有待努力的尋找與探求，然今日方領悟到，惻隱之仁實則全然地、完完整整的內具於吾人身心之中。

這樣的詩作，無疑同於《朱子晚年定論》特別錄存朱子言「更須深自自省，收拾身心，漸令向裡」或「為學之要，只在著實操存，密切體認，自己身心上理會」等說。⁷⁰猶有進者，張元忭在《悟後詩》中更是輯錄了不少朱子言「心」的詩篇，不難理解這是意在由回歸身心用功，進而突顯「心」的發明與朗現之意。如〈寄吳公濟兼簡李伯諫〉原有五首作品，《悟後詩》收錄了其中三首，請看其中的兩首：

客子歸來春未深，祇應寒雨罷登臨。閉窗竟日焚香坐，一段孤明見此心。⁷¹

憶昔殊方久滯淫，年深歸路始駸駸。傍人欲問箠瓢樂，理義誰知悅我心？⁷²

第一首，朱子抒寫身為客居他方的遊子（自己）在早春之時因一場突如其來的料峭寒雨，放棄了遠行登臨的旅程，似乎是無功而返，敗興而歸了，但是返家後，卻意外地獲得一段能自己獨處的時光，得以終日焚香閑坐，照見內心無所依傍、執染，且朗朗明覺不昧的空明境界。第二首詩中提到回想過去，自己錯用方法，長久停滯在錯誤的學問觀點上，待年華老大才迷途知返，因而感到光陰已倏忽消逝。縱使如此，朱子依然在箠瓢屢空的困頓生活中保有怡然自得之樂，何以能如此？朱子答覆：其實這不外乎聞道之樂，也就是體會理義之悅我心。

又《悟後詩》首列朱子著名的〈齋居感興〉詩十五首（全組詩有二十首），其中不乏對「心」的描述，如第三首言「人心妙不測，出入乘氣機」，這是對

⁷⁰ 此為王陽明《朱子晚年定論》中第 14 首〈答周純仁〉與第 15 首〈答竇文卿〉，參見陳榮捷，《王陽明傳習錄詳註集評》，頁 427。

⁷¹ [明]張元忭，《朱子摘編》，卷下，《悟後詩》，第 62 首，頁 16b。

⁷² [明]張元忭，《朱子摘編》，卷下，《悟後詩》，第 64 首，頁 17a。

靈妙之心的特質說明；第四首稱「靜觀靈臺妙，萬化此從出」，則以靈臺喻心，點出其為萬化之根；第五首則言人之「心」中良善的本質是「幾微諒難忽，善端本綿綿」，因此要「恭惟皇上帝，降此仁義心」(第十四首)；第六首乃從寰宇「南北極」中的根源者「太一」收攝到「人心要如此，寂感無邊方」，所以，當「恭惟千載心，秋月照寒水」(第七首)。⁷³

除此之外，關於論「心」的詩篇，張元忭還選錄了鑑照之喻的詩作，如「神心洞玄鑿，好惡審薰蕕」一語，⁷⁴表示心之神妙能洞燭善惡，就如同鑑照妍媸，以及能夠清楚地辨明香草抑或惡臭之植物一般，還有〈克己〉一詩：

寶鑑當年照膽寒，向來埋沒太無端。祇今垢盡明全見，還得當年寶鑑看。⁷⁵

這是以拭鏡復明為喻，蓋人之始生，本有一光明照徹的赤子之心，但不免受到氣稟物欲的遮蔽與掩覆，因而變得晦暗不明，倘若今日能刮垢磨光，使其本有之光明復見，則其依舊是原初的光明寶鑑。正所謂「語默趣雖殊，晦明心本一」。⁷⁶

綜上所述，當可說張元忭所編《朱子摘編》下卷《悟後詩》的選詩原則，在於呼應《朱子晚年定論》之論旨：突出朱子自悔讀書支離之弊與返歸自家身心上探求，進而突顯「心」的發明與朗現。

三、《悟後詩》的文獻效力與其推陳出新之處

前文徵引到《悟後詩》中堪與《朱子晚年定論》呼應的詩篇，約莫二十首，在《悟後詩》選錄的詩作(九十四首)中佔比並不高，這一點提醒我們當該採取批判省思的角度，檢討張元忭選輯《悟後詩》的作品是否真能如其所

⁷³ [明]張元忭，《朱子摘編》，卷下，《悟後詩》，第3-7、14首，頁1b-2b、4a。

⁷⁴ [明]張元忭，《朱子摘編》，卷下，《悟後詩》，第17首，頁5b。

⁷⁵ [明]張元忭，《朱子摘編》，卷下，《悟後詩》，第50首，頁14b。

⁷⁶ [明]張元忭，《朱子摘編》，卷下，《悟後詩》，第18首，頁5b。在《悟後詩》中也有「河洛傳心後，毫釐復易差。……本本初無二，存存自不邪。誰知經濟業，零落舊煙霞」的詩篇。見[明]張元忭，《朱子摘編》，卷下，《悟後詩》，第31首，頁9b-10a。

預想的避免非盡屬朱子「晚年」作品的錯誤，也就是說，有必要先就其所錄詩作的寫作時間進行繫年考核，檢視這些詩篇是否真為朱子「晚年」時期的作品，進而解明其輔助論證《朱子晚年定論》之有效與否。

為落實這項研討工作，首先關於朱子詩作的繫年考察，本文參考郭齊、尹波所編《朱熹文集編年評注》與東景南《朱熹年譜長編》兩書，⁷⁷整理所選錄詩作的寫作時間，執行成果即本文文末之附錄「《朱子摘編》卷下《悟後詩》輯錄詩作繫年」一表格。

其次，何謂「晚年」？早、中、晚三期，時間點如何界定？筆者則是參酌申美子《朱子詩中的思想研究》之說法，該書以朱子享壽七秩晉一為期，則三十四歲以前為早年時期，三十五至四十九歲為中年時期，五十歲以上為晚年階段。⁷⁸此中早年與中年的分界，乃以朱子三十四歲之時，其師李延平辭世為界線。此一界限之劃分本無不可，但眾所周知，以朱子的思想發展歷程言，其思想型態確立於四十歲的「中和新說」之悟，故筆者傾向以朱子不惑之年為早年與中年的分界點。準此，依據附錄「《朱子摘編》卷下《悟後詩》輯錄詩作繫年」的彙整成果（其中若干詩作的寫作時間，或有不同的看法，則採計較晚的時間點），可將《悟後詩》五十一題詩作依寫作時間整理為下面表 1「《悟後詩》詩作繫年統計表」：

表 1 《悟後詩》詩作繫年統計表

	早年 ~ 40 歲	中年 41 ~ 49 歲	晚年 50 ~ 71 歲	未詳 (未能考知)
選詩數量 51 題 (94 首)	28 題	10 題	9 題	4 題
佔比率	54.9 %	19.6 %	17.6 %	7.8 %

⁷⁷ 郭齊、尹波，《朱熹文集編年評注》（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9）；東景南，《朱熹年譜長編（增訂本）》（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4）。

⁷⁸ 申美子，《朱子詩中的思想研究》（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8）。

由上表的統計，明白可見《悟後詩》五十一題（九十四首）的詩作選編，其實晚年之作的佔比很低，僅有九題，佔比率 17.6%，是早、中、晚三期作品中最少的，且以年歲來看，所收錄的作品大抵是五十至五十九歲之作，也難以代表朱子晚年的整體詩歌創作表現。相反地，早年的詩作竟高達二十八題，佔比率將近五成五，有最早紹興二十二年（1152）二十三歲時的少作，且以乾道年間三十餘歲的作品最為大宗。

所以，以今日可見《朱文公文集》、《別集》所錄存的一千兩百餘首詩作數量言，《悟後詩》所收錄者僅止五十一題（九十四首），其代表性本有待商榷。且更進一步，以上文統計數據，就《悟後詩》所收錄詩作的核實繫年來說，篇中收錄的九十四首詩作恐怕也不足以作為朱子晚年思想情狀的真實反映，因為確實為朱子晚年（五十歲以上）的作品為數僅九題（十八首，含〈武夷權歌十首〉），是故，不得不說《悟後詩》的編輯，其實與陽明的《朱子晚年定論》一樣，皆違犯「年代失考」以致證據效力不足的嚴重缺失。但是如果我們能暫時跳脫張元忭編選《悟後詩》的引證效力問題，單純就張元忭的編纂用心而觀，思考的問題點或許會有所不同，也就是說，這些選錄的作品是否又有越乎《朱子晚年定論》的論旨之外，代表張元忭個人的獨特理解之處呢？準此角度言，下面兩個詩作選錄的特點，便呈現出張元忭個人的獨特體會與主張。

一者，從《悟後詩》所輯錄的作品中，可以看到相當數量的山水詩作，如〈望西山〉、〈石磴〉、〈水口行舟〉、〈小盈道中〉、〈偶題三首〉、〈趁韻〉、〈次韻擇之漫成〉、〈次韻擇之舟中有作二首〉、〈次韻擇之金步喜見大江有作〉、〈次韻擇之餘干道中〉，以及〈武夷權歌十首〉等，⁷⁹尤其是在〈武夷權歌〉之後，張元忭記有一案語如下：

先生〈武夷權歌〉直寫道妙，非徒玩弄光景而已，讀者當深味之。⁸⁰張氏提醒讀者留意這組套詩雖是朱子仿照民間船歌的戲作歌謠，但是詩中所

⁷⁹ 此處列舉者至少二十三首詩作，分別見〔明〕張元忭，《朱子摘編》，卷下，《悟後詩》，第 47、48、49、70、72-74、75、80、81-82、83、84、85-94 首，頁 14a-b、18a-19a、19b-22a。

⁸⁰ 〔明〕張元忭，《朱子摘編》，卷下，《悟後詩》，頁 22a。

言並非只是隨意遊賞武夷九曲的風光景色，其所傳達的乃是對於「道妙」的抒寫與揭示。⁸¹然則何謂「道妙」呢？僅上述一單詞片語，不是很容易給出回覆，因此，且讓我們先來觀察張元忞究竟收錄了那些作品，再返回來推敲其選文與標明案語指點讀者的可能用意。

一般的山水詩，多半意在描繪山川景色，寓情於景，以求營造出情景交融的絕美詩境。然而朱子的山水詩作，除了有優遊山林之樂、隱逸山林之志的作品外，更有自然山林即「道」之展現的深刻體悟，⁸²如〈水口行舟〉一詩：

昨夜扁舟雨一簑，滿江風浪夜如何？今朝試捲孤篷看，依舊青山綠樹多。⁸³

詩中記述朱子昨夜宿於一葉扁舟之中，經歷了一夜的風雨，天亮後，不知船外的景況如何，乃挽起窗上的簾蓬往外望，發現映入眼中的依舊是青翠的山巒與綠樹。這首詩並不難解，但仔細品味可以感受到末句所呈現的景色，呈現的是生生不息的生命律動，同樣的意涵與情境，在下面的三首詩作中表達得更為顯豁與確切：

寒盡春生草又青，化工消息幾曾停？因君一詠陵陂麥，恍憶農家老圃亭。⁸⁴

⁸¹ 在這個意義上，若回顧元代學者陳普（石堂，1244-1315）為〈武夷櫂歌〉作注，強調這組詩「純是一條進道次序」之說，相互較論，實深具趣味。然較可惜的是張元忞的觀點並沒有展開，故本文僅將此點提出，不擬進行討論。另〈武夷櫂歌〉在東亞，尤其是在韓國引發了極大的迴響，雖不乏贊同陳普之說者，但也有主張這組詩只是「因物起興」，別有理趣的作品。參考李鐘虎，〈韓國九曲文化研究現況與課題——以九曲經營與九曲詩為中心〉，收入張品端主編，《朱子學與退溪學研究：中韓性理學之比較》（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15），頁147-158；衣若芬，〈印刷出版與朝鮮「武夷九曲」文化意象的「理學化」建構〉，收入石守謙、廖肇亨主編，《轉接與跨界——東亞文化意象之傳佈》（臺北：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2015），頁351-387；衣若芬，〈遊觀與求道：朱熹「武夷櫂歌」與朝鮮士人的理解與續作〉，《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60（2015），頁53-70。

⁸² 林佳蓉，〈朱子詩中的山林意趣〉，《文與哲》，4（2004），頁415-437。

⁸³ [明]張元忞，《朱子摘編》，卷下，《悟後詩》，第49首，頁14b。

⁸⁴ [明]張元忞，《朱子摘編》，卷下，《悟後詩》，第84首，頁20b。

世間無處不陽春，道路何曾困得人！若向此中生厭斁，不知何處可安身。⁸⁵

天理生生本不窮，要從知覺驗流通。若知體用元無間，始笑前來說異同。⁸⁶

第一首詩逕由冬去春來，一元復始的季節變化，彰明天地創化生生不已之幾何曾止息。第二首詩的詩題是「次韻擇之見路旁亂草有感」，可見朱子從路旁不起眼、雜亂的野草上看到「世間無處不陽春」，是一幅春意盎然，生機蓬勃的景象，所以在他看來，世間的道路縱使蜿蜒崎嶇，但何曾真能使人拘困於原地，實則止步不前的終究是自己的心志使然。第三首詩則直接述說「天理生生」本無窮已，正所謂「天機元自爾，不是故匆匆」，⁸⁷只是我們需要從萬物生長起滅，循環往復的生化化之過程中加以察覺、體驗。

有此領會後，再讓我們來看朱子詠春之作：

勝日尋芳泗水濱，無邊光景一時新。等閑識得東風面，萬紫千紅總是春。⁸⁸

聞道西園春色深，急穿芒屨去登臨。千葩萬蕊爭紅紫，誰識乾坤造化心？⁸⁹

在風和日麗的時刻，於泗水濱上探幽尋芳，得見大地逢春，頓時染上一片新翠，因而感受到滿盈而無邊的蓬勃朝氣。在一閑逸安適的心境下，得遇此明媚春光，終於體會到這「萬紫千紅」的生命表現無一不是生生不已的天道朗現。又聽聞西園百花盛開，春意正濃，於是趕忙穿上草履去照看，果見百卉千葩爭相綻放，然而在此「萬紫千紅」的生命表現中，又有誰真能察識到造化乾坤的「天地生物之心」呢？可以看到這兩首詩同於前面所徵引的「天理生生本不窮」、「化工消息幾曾停」之詩作，都在傳達同樣的意象觀點，尤其「等閑識得東風面，萬紫千紅總是春」亦是朱子哲理詩的名句，更有意思的是在這首詩之下，張元忭特別下了一句案語：「東風面常在目前，默而識之，頭

⁸⁵ [明]張元忭，《朱子摘編》，卷下，《悟後詩》，第79首，頁19b。

⁸⁶ [明]張元忭，《朱子摘編》，卷下，《悟後詩》，第60首，頁16b。

⁸⁷ [明]張元忭，《朱子摘編》，卷下，《悟後詩》，第34首，頁10b。

⁸⁸ [明]張元忭，《朱子摘編》，卷下，《悟後詩》，第53首，頁15a。

⁸⁹ [明]張元忭，《朱子摘編》，卷下，《悟後詩》，第54首，頁15a-b。

頭是道」，提醒我們若能恰當地默識體察，則歷歷在目的「東風面」，無非是朗朗「天道」的展現。接下來，我們可以回來思考〈武夷權歌〉所體現的「道妙」為何，底下以五曲、八曲、九曲這三首為例：

五曲山高雲氣深，長時烟雨暗平林。林間有客無人識，欸乃聲中萬古心。⁹⁰

八曲風烟勢欲開，鼓樓巖下水滌洄。莫言此處無佳景，自是遊人不上來！⁹¹

九曲將窮眼豁然，桑麻雨露見平川。漁郎更覓桃源路，除是人間別有天。⁹²

〈武夷權歌〉不乏研究者討論，本文的詮解脈絡乃是將它放在山河大地的自然風光即是生生不已的「天道」展現一理路下來體會。第五曲所見的景色是山勢險峻高聳，雲氣繚繞，也因此這裡往往呈現煙雨霏霏，雨霧飄渺的幽闇林景。然而，林間有位無人相識的野叟騷客（指的就是朱熹自己），卻默默地在欸乃的船歌聲中契悟到萬古以來天地生物造化的不已之心。第八曲所言的景色已是雲破天開，風霧煙雨散去的情景，且在鼓樓巖往下看著江水迴旋。朱子以為莫道此處無佳景，只要細心地體會何嘗不是觸目即春，舉目見道呢！最後，第九首，則是溪遊將盡，眼前已是豁然開朗的平川曠野、桑麻百姓人家。則漁人何需他求，另覓桃花源之路呢？除非人間之外，別有天地。言下之意，只此當下安然自適的武夷山水之樂即是桃源仙境、人間樂土，同時，也是天地生生之妙道的當體呈現。

再者，在《悟後詩》所輯錄的詩篇中，還有相當比例的作品涉及到佛老思想的問題，如〈久雨齋居誦經〉、〈誦經〉、〈齋居聞磬〉、〈讀道書作四首〉、〈歲寒軒與諸羽客同飲次公濟韻〉、〈答景仁奉別〉、〈閑坐〉、〈擇之誦所賦擬呂子進元霄詩因用元韻二首〉、〈導引次秀野韻〉、〈公濟和詩見閔耽書勉以教外之樂以詩請問二首〉，以及為學界所熟知的〈齋居感興〉之作等。⁹³這部分

⁹⁰ [明]張元忭，《朱子摘編》，卷下，《悟後詩》，第90首，頁21b。

⁹¹ [明]張元忭，《朱子摘編》，卷下，《悟後詩》，第92首，頁22a。

⁹² [明]張元忭，《朱子摘編》，卷下，《悟後詩》，第94首，頁22a。

⁹³ 此處若將〈齋居感興二十首〉（《悟後詩》選錄十五首）中涉及佛老用語與精神者採納計算，則至少有十七首詩作，分別見[明]張元忭，《朱子摘編》，卷下，《悟後

的作品較為紛雜，參照本文後方附錄所作的繫年考訂，可知其中一方面或為朱子早年階段（四十歲以前）對佛老之道的嚮往與追求，如〈久雨齋居誦經〉等；另一方面也有其中年時期以後歸返儒家的關佛反老之言論，如〈答景仁奉別〉等，更有在潛心靜修的高蹈生活中看到他對儒、釋、道三教思想的交涉與融通，如〈齋居感興〉等。⁹⁴然而，《悟後詩》何以要收錄這些作品呢？

若我們考量到張元忬在《朱子摘編》中對於朱子「悟後」之詩作的選輯並未切實進行年代考證，而是相對籠統地以他個人所主張的朱子所有悔悟為原則，則跳脫寫作時間先後的問題，或許可說其編輯用心意在於突顯朱子從「莫談空諦莫求仙」的批判佛老，轉為「不妨隨境味玄幽」的生命境界之蘄向。⁹⁵如〈公濟和詩見閔耽書勉以教外之樂以詩請問二首〉便是朱子針對友人吳楫（生卒不詳）勸勉尋求「教外別傳」的禪悅之樂以自適的回應，詩中直言不諱地對佛教表達排拒的立場，詩云：

至理無言絕淺深，塵塵剝剝不相侵。如云教外傳真的，卻是瞿曇有兩心。⁹⁶

未必瞿曇有兩心，莫將此意攪儒林。欲知陋巷憂時樂，只向韋編絕處尋。⁹⁷

亙古來今，通貫宇宙的至極真理本無淺深、高下之別，下學之處便有上達之妙，殊別的萬象之中自有萬理存焉，雖於顯現之相上有異，然眾理本一，實不違其同。朱子回應說：倘若佛陀既已講經立「教」，卻又別開不立文字的「教外」一途，豈非懷有兩心？縱使其未必有兩心，實則也不必將禪門工夫拿來攪擾儒林，因為儒家「居陋巷，不改其憂」的樂處還應在讀書（韋編三絕）中

詩》，第 1-15（其中第 1、3、10、11、15 首）、21、22、23、24-27、28、29、35、44、65-66 首等，頁 1a-b、3a-b、4b、6b-9a、10b、13a-b、17a-b。

⁹⁴ 鍾彩鈞，〈朱子的高蹈生活〉，收入鍾彩鈞編，《朱子學的開展——學術篇》（臺北：漢學研究中心，2002），頁 263-297。

⁹⁵ 此兩詩句出自〔宋〕朱熹，《朱文公文集》，收入〔宋〕朱熹，《朱子全書》，冊 20，卷 7，〈次韻四十叔父白鹿之作〉，頁 474；同書，卷 3，〈次秀野雜詩韻·葺居二首〉之一，頁 340。

⁹⁶ 〔明〕張元忬，《朱子摘編》，卷下，《悟後詩》，第 65 首，頁 17a。

⁹⁷ 〔明〕張元忬，《朱子摘編》，卷下，《悟後詩》，第 66 首，頁 17b。

尋求，而非在於文字之外，透過默坐澄心以別求禪悅。⁹⁸

復次，朱子不僅批判佛教「迷心昧性哂竺學」，同樣，對於「貪生惜死悲方仙」的道教也頗不以為然，⁹⁹其曰：

蓬萊清淺今幾年？武夷突兀還蒼然。但忻丹籍有期運，不悟翠壁無夤緣。鼎中龍虎應浪語，紙上爻象非真傳。明朝猿叫三峽路，一葉徑上滄浪船。¹⁰⁰

詩中以道教蓬萊仙山與此行遊觀之地——武夷山進行對比，蓬萊山的清淺變化，幾經滄桑，而武夷山依舊蒼翠地矗立著。代表道教的丹書道藏有幸得以流傳固然值得欣喜，但游觀山水以體道是無需向外求索、攀緣的，如此說來，鼎中水火、鉛汞恐屬多餘，形式上的文字、符號亦非真諦本身，不能於此有所領悟，難免使人抱憾。

然而，對反此一批駁佛老的立場，《悟後詩》所收錄者，更多的是對於佛禪之虛靜和道仙之玄趣的心靈境界與生命情調的體證與追求。¹⁰¹如下面這首詩所言：

端居獨無事，聊披釋氏書。暫釋塵累牽，超然與道俱。門掩竹林幽，禽鳴山雨餘。了此無為法，身心同晏如。¹⁰²

朱子直抒胸臆地表露他在端居無事之際，披覽佛教典籍，不僅有助於暫時放下塵世的繫累與牽掛，更能使身心獲得安頓，安然自適，甚至可以體會到「超然與道俱」的生命感受。再如〈次韻伯崇自警〉一詩，詩作：

誦君佳句極優柔，未得明強是所憂。若悟本來非木石，保君弘毅不能休。¹⁰³

此詩淺顯明白，說的是朱子對友人范念德（生卒不詳）的勸勉。他以為對方的言語表達極為溫和良善，但是，字裡行間顯露出缺乏明確直率、剛勇果決的

⁹⁸ 本文徵引朱子詩作中，關於「坐脫、影響」、「孤明」、「教外之樂」等佛家語的詮解說明，得益於論文審查人的指點，不敢掠美，特誌之，以致謝忱。

⁹⁹ 此兩詩句出自〔明〕張元忞，《朱子摘編》，卷下，《悟後詩》，第29首，頁8b。

¹⁰⁰ 〔明〕張元忞，《朱子摘編》，卷下，《悟後詩》，第28首，頁8a。

¹⁰¹ 林佳蓉，〈朱熹詩中的佛老意識〉，《國文學報》，33（2003），頁165-188。

¹⁰² 〔明〕張元忞，《朱子摘編》，卷下，《悟後詩》，第21首，頁6b。

¹⁰³ 〔明〕張元忞，《朱子摘編》，卷下，《悟後詩》，第69首，頁18a。

精神。於是他提醒好友若能參悟得「本來非木石」，定能保有寬宏堅毅，健動不已而無法止息的行動力。張元忬在此詩下也罕見地落下一案語，強調「非的見本來者，不能作此語」。這個提醒，讓我們注意到此處朱子或援用了禪門參悟「本來面目」的話頭，來說明儒家剛健奮發的精神。此又為朱子援佛語入詩，表現出詩人之情志、道學之理趣、釋家之禪韻以及景象之意境相互交融滲透的特點。¹⁰⁴

與此相類，朱子也對於道教典籍抱有高度興趣，他曾經表示「清夜眠齋宇，終朝觀道書」，¹⁰⁵又云：

坐厭塵累積，脫躡味幽玄。靜披笈中素，流味東華篇。朝昏一俯仰，歲月如奔川。世紛未云遣，仗此息諸緣。¹⁰⁶

若欲擺脫塵世俗務的牽累與紛擾，朱子認為靜下心來閱覽書籍中的道籍是最好的方法，且根據他的經驗，一埋首其中，品味幽玄之境，俯仰間，光陰荏苒，歲月如梭，不需刻意地排遣，即可平息人世間各種的拘執與牽繫。

不僅如此，《悟後詩》復選錄了「不學飛仙術，日日成醜老」、「東華綠髮翁，授我不死方。願言勤脩學，接景三玄鄉」等詩句，說明朱子對於修道成仙以「妙入玄中境」的嚮往與努力。¹⁰⁷此外，如同朱子化用佛教的語詞、典故或觀念入詩，也有學者指出，在〈齋居感興〉詩中，朱子同樣也運用了諸多與丹道相關的字詞及語彙，如昆侖、元化、金鼎、玄天等，來表達他對最高境界、終極實際的體會與上達天道的修行方法，凡此，皆融涉了道教練丹及養生之術的思想在其中。¹⁰⁸

總上所述，針對《朱子摘編》下卷《悟後詩》所收錄的詩作，進行內容分析，可以看到張元忬選錄朱子詩作，一方面，呼應王陽明《朱子晚年定論》

¹⁰⁴ 邱蔚華，《朱熹文學與佛禪關係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9），頁 193-264。

¹⁰⁵ [明]張元忬，《朱子摘編》，卷下，《悟後詩》，第 24 首，頁 7a。

¹⁰⁶ [明]張元忬，《朱子摘編》，卷下，《悟後詩》，第 22 首，頁 6b。

¹⁰⁷ 此處徵引的詩句，錄自 [明]張元忬，《朱子摘編》，卷下，《悟後詩》，第 27、26、19 首，原出自 [宋]朱熹，《朱文公文集》，收入 [宋]朱熹，《朱子全書》，冊 20，卷 1，〈讀道書作六首〉，頁 236；同書，卷 2，〈濠上齋二首〉，頁 295。

¹⁰⁸ 史甄陶，〈論朱熹〈齋居感興二十首〉與丹道之學的關係〉，《清華中文學報》，17（2017），頁 135-172。

言朱子晚年自悔讀書支離之弊與「心」的發明與朗現；另一方面，《悟後詩》收錄為數甚夥的山水詩以及與釋老相關的哲理詩，表達自然山水即「道」之體現以及融通佛老清淨玄妙的精神境界為其生命蘄向這兩點，則是張氏越出《朱子晚年定論》編旨之外的個人領會與發明。

四、結語

本文以王陽明的《朱子晚年定論》一書在此書刊行，引發廣大的迴響，更遭遇到嚴厲的批評，尤其是明確指出該書所錄存之文獻有考證失實之處，而是否仍有承繼、輔翼之作品問世為問題意識的出發點。經研究考察可知：雖然《朱子晚年定論》之作存在差謬處，但在王學陣營中仍有其流通性，如：陽明的高足錢德洪便增補為三卷本加以刊行；繼之，王龍溪的門人張元忭也編纂了《朱子摘編》這部書來佐助、推闡陽明之說。本論文即針對《朱子摘編》這一罕見善籍進行探討。

細究此書編纂之體例，其乃收錄了陽明《朱子晚年定論》為上卷，復選輯九十四首朱子詩作稱《悟後詩》作為下卷，合編於一冊。又透過考察張元忭的〈自序〉、楊起元的〈跋〉文以及兩篇重刊之〈序〉文，可以明白該書的編纂動機，即張元忭擬透過對《朱子晚年定論》的擴編與案語提示指明朱子晚年自悔支離，改以信持本心善性為宜優先挺立之本源工夫，進而主張朱子、象山、陽明三人之學可相互融通為一。此外，在具體的纂輯策略上，他發現到《性理大全》卷七十所收錄的朱子詩篇，與自己的想法、觀點不謀而合，故或取之為下卷《悟後詩》的基礎選文；也通過與泰州學派的楊起元一同商討研議，來凝聚學友們的共識，提高此著作的公信力。

然而，深入考覈下卷《悟後詩》的文獻效力，卻可發現其所選錄者多非「晚年」悔悟之作，反而泰半是朱子早年（四十歲以前）的作品，所以，下卷的編輯恐有證據效力不足的缺失。但是，若能單就其所選輯的詩作來加以觀察，將可察覺到張元忭的選詩原則，一方面呼應了《朱子晚年定論》之論旨：朱子深悔耽溺書冊之支離工夫，改為回歸身心用功，彰顯心的朗現與發明；另一方面，又收錄相當份量的山水詩以及涉及佛老的詩篇，則呈現出張

元忞刻意指明朱子從山林之樂中默契道妙與接納、兼採釋、道二教的個人特殊觀點。

最後，若將此書安放於「朱陸異同論」的學術脈絡中，可以讓我們了解到在王陽明《朱子晚年定論》一書遭受到強力的反對與批駁之時，其實在陽明學陣營中，仍不乏支持者，他們一再地透過朱子文獻的選編與纂輯工作，來回應種種的質疑，本文的研究對象張元忞《朱子摘編》即是一確例，而非要待至清中葉李紱的《朱子晚年全論》刊行，才有羽翼贊同者，故本研究當有助於補充學界對於「朱陸異同論」之學術發展史的全面認識。又其透過詩歌作品，來作為佐證文獻的方法，以及《悟後詩》選錄詩作中所展示的思想面貌，亦能擴大對於研究朱子思想的材料視野，以及豐富對於朱子之學的理解面向。

本文於 2023 年 1 月 16 日收稿；2023 年 8 月 17 日通過刊登

責任校對：江昱緯

附錄 《朱子摘編》卷下《悟後詩》輯錄詩作繫年

編號	詩題	《朱文公文集》	《朱熹文集編年評注》	《朱熹年譜長編》	朱子年歲
		卷次 頁碼	繫年 (頁碼)	繫年 (頁碼)	
1-15	齋居感興二十首(錄15首)	卷4 頁360	乾道八、九年間 (頁313)	乾道八年 (頁481)	43
16	二詩奉酬敬夫贈言并以為別	卷5 頁387	乾道三年 (頁393)	乾道三年 (頁382)	38
17	頃以多言害道絕不作詩兩日讀大學誠意章有感至日之朝起書此以自箴蓋不得已而有言云	卷2 頁283	紹興三十年前後 (頁139)		約31
18、 19	次韻潮州詩六首·濠上齋二首	卷2 頁295	紹興末 (頁175)	隆興二年 (頁321)	35
20	用前韻答方直甫	卷8 頁511	淳熙十年 (頁643)	淳熙十年 (頁780)	54
21	久雨齋居誦經	卷1 頁231	紹興二十二年 (頁30)		23
22	誦經	卷1 頁240	紹興二十三年 (頁50)	紹興二十三年 (頁161)	24
23	齋居聞磬	卷1 頁235	紹興二十二年 (頁38)	紹興二十二年 (頁153)	23
24- 27	讀道書作六首(其一至四)	卷1 頁236	紹興二十二年 (頁39)	紹興二十二年 (頁153)	23
28	奉同公濟諸兄自精舍來集冲佑之歲寒軒因邀諸羽客同飲公濟有詩贈守元章師因次其韻	卷9 頁525	淳熙十年 (頁668)	淳熙十年 (頁769)	54

29	奉答景仁老兄贈別之句	卷 4 頁 366	淳熙四年 (頁 351)	淳熙四年 (頁 489)	48
30	讀機仲景仁別後詩語因及詩傳綱目復用前韻	卷 4 頁 367	淳熙四年 (頁 355)	淳熙四年 (頁 489)	48
31-33	挽延平李先生 三首	卷 2 頁 308	隆興二年 (頁 209)	隆興二年 (頁 322)	35
34	和秀野韻二首 (之一)	卷 3 頁 339	紹興中至淳熙初 (頁 273)	隆興二年以後 (頁 339)	35
35	次韻潮州詩六首·閑坐	卷 2 頁 295	紹興末 (頁 175)	隆興二年 (頁 321)	35
36、37	擇之誦所賦擬呂子進元宵詩因用元韻二首	卷 6 頁 415	乾道三年以後 (頁 449)		
38	仁術	卷 2 頁 283	紹興末 (頁 141)	紹興二十八年 至隆興二年 (頁 339)	29-35
39	聞善決江河	卷 2 頁 283	紹興末 (頁 142)	紹興二十八年 至隆興二年 (頁 339)	29-35
40	日用自警示平父	卷 6 頁 449	紹興二十三至 二十七年 (頁 529)	紹興二十七年 (頁 226)	28
41	次卜掌書落成白鹿佳句	卷 7 頁 473	淳熙七年 (頁 571)	淳熙七年 (頁 659)	51
42	寄林擇之	卷 6 頁 414	乾道五年 (頁 446)		40
43	鵝湖寺和陸子壽	卷 4 頁 365	淳熙六年 (頁 347)	淳熙六年 (頁 617)	50
44	次秀野雜詩韻·導引	卷 3 頁 342	淳熙初 (頁 276)		45

45	分水鋪壁間讀趙仲績 留題二十字戲續其後	卷 4 頁 353	淳熙三年 (頁 295)		47
46	墨莊五詠·玩易齋	卷 4 頁 359	乾道四至九年間 (頁 311)		39- 44
47	列岫望西山最正殆無 毫髮遺恨藤王秋屏皆 不及也因作此詩二首 (之一)	卷 5 頁 401	乾道三年 (頁 425)	乾道 3 年 (頁 382)	38
48	百丈山六詠·石磴	卷 6 頁 434	淳熙元年 (頁 499)	淳熙元年 (頁 514)	45
49	水口行舟二首 (之一)	卷 10 頁 553	淳熙十四年 (頁 735)	淳熙十四年 (頁 859)	58
50	克己	卷 2 頁 285	紹興末 (頁 147)	隆興元年 (頁 315)	34
51、 52	觀書有感二首	卷 2 頁 286	乾道二年 (頁 150)	乾道二年 (頁 361)	37
53、 54	春日、春日偶作	卷 2 頁 285	紹興二十六至 二十七年 (頁 148-149)	紹興二十八年 至隆興二年 (頁 339)	27- 35
55	答袁機仲論啟蒙	卷 9 頁 528	淳熙十三年以後 (頁 680)	淳熙十三年 (頁 842)	57
56、 57	易二首	卷 10 頁 556	慶元中 (頁 744)		
58	出山道中口占	卷 9 頁 525	淳熙十一年 (頁 669)	淳熙十五年 (頁 886)	55/59
59	次呂季克東堂九詠· 月臺	卷 8 頁 505	淳熙十年 (頁 627)		54
60、 61	送林熙之詩五首 (之三、五)	卷 6 頁 418	乾道四年 (頁 456)	乾道四年 (頁 403)	39

62-64	寄吳公濟兼柬李伯諫 五首 (之一、三、五)	卷 6 頁 432	隆興二年 (頁 493)	乾道七年 (頁 445)	35/42
65、 66	公濟和詩見閔耽書勉 以教外之樂以詩請問 二首	卷 6 頁 432	隆興二年 (頁 495)	乾道七年 (頁 445)	35/42
67、 68	伯諫和詩云邪色蛙聲 方漫漫是中正氣愈駸 駸予謂此乃聖人從心 之妙三歎成詩重以問 彼二首	卷 6 頁 433	隆興二年 (頁 496)	乾道七年 (頁 445)	35/42
69	次韻伯崇自傲二首 (之二)	卷 5 頁 391	乾道三年 (頁 405)	乾道三年 (頁 382)	38
70	小盈道中	卷 2 頁 271	紹興二十五年 (頁 108)	紹興二十六年 (頁 207)	26/27
71	復齋偶題	卷 2 頁 284	紹興末 (頁 145)	紹興二十九年 (頁 246)	30
72-- 74	偶題三首	卷 2 頁 302	未詳 (頁 193)		
75	趁韻	卷 10 頁 546	未詳 (頁 717)		
76-- 78	奉答擇之四詩意到及 書不及次韻	卷 5 頁 391	乾道三年 (頁 405)	乾道三年 (頁 382)	38
79	次韻擇之見路傍亂草 有感	卷 5 頁 392	乾道三年 (頁 407)	乾道三年 (頁 382)	38
80	次韻擇之漫成	卷 5 頁 399	乾道三年 (頁 421)	乾道三年 (頁 382)	38
81、 82	次韻擇之舟中有作二 首	卷 5 頁 400	乾道三年 (頁 424)	乾道三年 (頁 382)	38
83	次韻擇之金步喜見大 江有作	卷 5 頁 404	乾道三年 (頁 432)	乾道三年 (頁 382)	38

84	次韻擇之餘干道中	卷 5 頁 404	乾道三年 (頁 433)	乾道三年 (頁 382)	38
85- 94	淳熙甲辰中春精舍閒 居戲作武夷權歌十首 呈諸同遊相與一笑	卷 9 頁 525	淳熙十一年 (頁 670)	淳熙十一年 (頁 787)	55

資料說明：

1. 詩作的卷次與頁碼，依照〔宋〕朱熹，《朱文公文集》，收入〔宋〕朱熹著，朱杰人、嚴佐之、劉永翔主編，《朱子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冊 20。
2. 「編號」中，標示□者，為同樣錄存於〔明〕胡廣等奉敕撰，《性理大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卷 70 中之朱子詩作。
3. 表格中詩作的時間繫年，參考郭齊、尹波，《朱熹文集編年評注》（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9）與束景南，《朱熹年譜長編（增訂本）》（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4）兩書。

徵引文獻

一、傳統文獻

- 〔宋〕朱熹著，朱傑人、嚴佐之、劉永翔主編，《朱子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
- 〔明〕王守仁著，錢明編校，《王陽明全集（新編本）》，浙江：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
- 〔明〕胡廣等奉敕撰，《性理大全書》，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7，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
- 〔明〕張元忭，《朱子摘編》，臺北：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藏，明萬曆四十二年（1614）重刻本。
- 〔明〕張元忭撰，錢明編校，《張元忭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
- 〔明〕黃宗羲著，《明儒學案》，收入吳光、沈善洪主編，《黃宗羲全集》，冊 7-8，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
- 〔明〕楊起元，《續刻楊復所先生家藏文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冊 167，臺南：莊嚴文化事業公司，1997，據天津圖書館藏明楊見峻等刻本影印。
- 〔明〕劉文卿，《新刻劉直洲先生文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冊 172，臺南：莊嚴文化事業公司，1997，據明萬曆唐國達刻本影印。
- 〔明〕薛應旂，《方山先生文錄》，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冊 102，臺南：莊嚴文化事業公司，1997，據明嘉靖三十三（1554）年刻本影印。
- 〔清〕張奇勛、〔清〕周士儀纂修；〔清〕譚弘憲、〔清〕周士儀續修，〔康熙〕《衡州府志》，收入《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史部地理類冊 36，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8，據清康熙十年（1671）刻二十一年（1682）續修本影印。
- 〔清〕劉繹、〔清〕趙之謙等纂，〔清〕曾國藩、〔清〕劉坤一等修，〔光緒〕《江西通志》，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史部冊 660，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據光緒七年（1881）刻本影印。

二、近人論著

- 史甄陶，〈論朱熹〈齋居感興二十首〉與丹道之學的關係〉，《清華中文學報》，17（2017），頁 135-172。
- 永富青地，〈關於《朱子晚年定論》的單行本〉，《故宮學術季刊》，26：2（2008），頁 89-103。
- 永富青地，《王守仁著作の文献学的研究》，東京：汲古書院，2007。
- 田富美，〈清初朱陸異同論爭的一個側面——論王懋竑《朱子年譜》中鵝湖之會的書寫〉，《臺大中文學報》，72（2021），頁 149-190。
- 申美子，《朱子詩中的思想研究》，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8。
- 吉田公平，《陸象山と王陽明》，東京：研文出版社，1990。
- 衣若芬，〈印刷出版與朝鮮「武夷九曲」文化意象的「理學化」建構〉，收入石守謙、廖肇亨主編，《轉接與跨界——東亞文化意象之傳佈》（臺北：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2015），頁 351-387。
- 衣若芬，〈遊觀與求道：朱熹〈武夷權歌〉與朝鮮士人的理解與續作〉，《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60（2015），頁 53-70。
- 吳長庚，〈鵝湖之會與朱陸異同「早晚論」的歷史演變〉，《朱子學刊》，1（1999），頁 78-98。
- 吳長庚主編，《朱陸學術考辨五種》，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2000。
- 呂允在，〈明代浙江山陰世家張元忭的文人生活與著述〉，《藝術學報》，81（2007），頁 249-271。
- 李鐘虎，〈韓國九曲文化研究現況與課題——以九曲經營與九曲詩為中心〉，收入張品端主編，《朱子學與退溪學研究：中韓性理學之比較》（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15），頁 147-158。
- 束景南，《朱熹年譜長編（增訂本）》，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4。
- 束景南，《陽明大傳：「心」的救贖之路》，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20。
- 林佳蓉，〈朱熹詩中的山林意趣〉，《文與哲》，4（2004），頁 415-436。
- 林佳蓉，〈朱熹詩中的佛老意識〉，《國文學報》，33（2003），頁 165-188。
- 邱蔚華，《朱熹文學與佛禪關係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9。

- 荒木見悟，〈明儒張陽和論：良知現成論の一屈折〉，《哲學年報》，25（1964），頁 97-136。
- 張克偉，〈論浙中王門學者張元忭之思想內涵與學術傾向〉，《哲學與文化》，18：10（1991），頁 916-932。
- 郭齊、尹波主編，《朱熹文集編年評注》，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9。
- 陳來，《朱子書信編年考證》，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7。
- 陳榮捷，《王陽明傳習錄詳註集評》，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2。
- 陳榮捷，《朱學論集》，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8 年。
- 游騰達，〈王懋竑《朱子年譜》探蹟與朱學宗旨之辯〉，《臺大中文學報》，65（2019），頁 117-162。
- 游騰達，〈論朱澤澐《朱子聖學考略》對「朱陸異同論」的文獻探析〉，《東華漢學》，14（2011），頁 109-148。
- 蔡龍九，《《朱子晚年定論》與朱陸異同》，新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1。
- 錢明，《王陽明及其學派論考》，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鍾彩鈞，〈朱子的高蹈生活〉，收入鍾彩鈞編，《朱子學的開展——學術篇》（臺北：漢學研究中心，2002），頁 263-297。
- 嚴佐之、戴揚本、劉永翔主編，《歷代「朱陸異同」典籍萃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
- 顧宏義、嚴佐之主編，《歷代「朱陸異同」文類彙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

The Lasting Impact of “Zhuzi wannian dinglun” on the Later Yangming School

—An Analysis of Zhang Yuanbian’s *Zhuzi*

zhaibian

Yu, Teng-ta*

Within the history of Song-Ming Neo-Confucian thought, Wang Yangming’s essay, *Master Zhu’s Definitive Views Arrived at Late in Life (Zhuzi wannian dinglun)*, stands as a pivotal work in the study of the contrast between Zhu Xi and Lu Jiuyuan. Its later impact is apparent in the two-volume work, *A Selection of Works About Zhuzi (Zhuzi zhaibian)*, edited by Zhang Yuanbian (1538-1588), and housed in the Fu Sinian Library, Academia Sinica, Taiwan. The first volume reprinted Wang Yangming’s *Zhuzi wannian dinglun* and the second entitled, *Poems After Enlightenment*, consists of ninety-four of Zhu Xi’s poems selected and edited by Zhang Yuanbian in support of Wang Yangming’s thesis. This article will first analyze this volume’s foreword, postscript, and publication history to highlight the author’s editorial efforts and strategies and the volume’s ensuing distribution. This will be followed by an analysis of each volume. With respect to the first volume, Zhang Yuanbian’ accepted that Wang was elucidating only the later years of Zhu Xi’s thought, but he also attempted to demonstrate the compatibility between Zhu Xi, Lu Jiuyuan, and Wang Yangming. With respect to the second volume, this article sorts out the dates of the selected poems and concludes that their content does not effectively support Zhang’s assertions. However, Zhang’s interlinear notes to the poems reveal his own unique reading

* Associate Professor, Institute of Sinophone Studies,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of Zhu Xi's experience of the Way when traveling and observing the landscape and Zhang's use of Buddhist and Daoist explanations. Through an analysis of *Zhuzi zhaibian*, this article will contribute to a fuller understanding of how late Ming exegetes distinguished between Zhu Xi and Lu Jiuyuan and reflects how one late Ming exegete interpreted Zhu Xi.

Keywords: Zhu-Lu comparison, *Zhuzi wannian dinglun*, Zhang Yuanbian, *Zhuzi zhebian*, Zhu Xi's poetry